



## 【论 文】

# “国家化”视野下的中国西南地域与民族社会\* ——以“苗疆走廊”为中心

杨志强<sup>1</sup>

**摘要:** 在当今兴起的区域史研究中,地域·区域文化多样性及特点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然而,如何看待强大中央集权制下由国家力量对少数民族社会带来的深刻影响,以及地域及族群文化多样性背后所隐含的普遍性文化表征及因果关系等问题,尚留有诸多有待思考和探索的空间。本文通过“古苗疆走廊”形成过程的追溯,初步探讨了国家力量、汉族移民及文化对西南边疆地区及各民族社会带来的冲击;认为明清时代西南边疆地区所经历的剧烈的社会变迁,其主要特点就是王朝权力依托“国家走廊”自上而下地开展“国家化”整合过程,其地域及族群文化多样性的形成与宏大的“国家叙事”间有着内在因果关联;进而对前近代时期的“国家化”等内涵进行了若干理论梳理与探讨。

**关键词:** 古苗疆走廊、国家化、内地化、汉族移民、华夷之辩

所谓的“苗疆走廊”,指的是元明时期以后新开辟的横跨东西横跨贵州省中部,连接湖广与云南的一条古驿道。历史上,这条驿道不仅是元明时期以后中原王朝控扼西南边疆的重要国家走廊,同时也直接促成了贵州建省,并深刻地影响了西南地区各民族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自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提出了“茶马古道”、“南方丝绸之路”等概念,对历史上中国西南交通与东南亚的经贸关系和文化交流等进行了诸多的研究与梳理,引起广泛的注目。然对明清时期曾对西南地区政治、经济诸方面产生重大影响的连接云南与内地往来的“东路”驿道,却缺乏应有的关注。2012年初,笔者和贵州大学研究团队同仁经过多年论证后首次提出了“苗疆走廊”概念,引起了学界同仁乃至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sup>[1][2][3][4][5]</sup>这一概念的提起,旨在聚焦和重新审视以往长期被“边缘化”的贵州省的地域及民族社会,同时方法论上注重从地域空间视野打破以往的行政区划的限制,将由古驿道勾连的沿线及周边地域视为互为关联的整体空间纳入研究视野。因这一课题甫经提起,涉及面广,尚有待学者今后的广泛参与和探讨,故本文在此抛砖引玉,对明清时期“苗疆走廊”开辟与西南地区“国家化”间的关系作若干展开与分析,并对前近代时期“国家化”之理论内涵进行初步梳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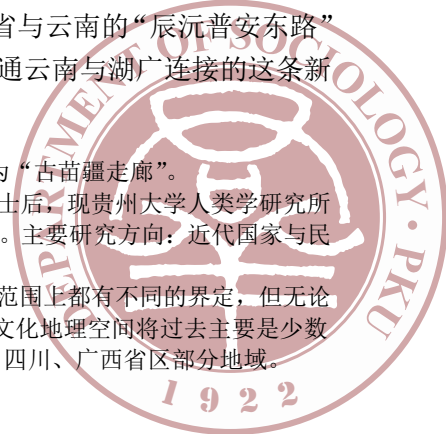
### 一、

西南地区位于云贵高原及向东南丘陵的过渡地带,境内崇山峻岭,自古以来交通就一直成为制约西南地区与中原王朝间政治关系发展和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因素。<sup>2</sup>元代统一云南后,开通了多条入滇交通路线。其中,至元二十八年(1291)开通的连接湖广行省与云南的“辰沅普安东路”成为此后西南边陲与内地交往的最重要的一条驿道。元代之所以要打通云南与湖广连接的这条新

\* 本文原载于《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14年第3期。“苗疆走廊”原为“古苗疆走廊”。

<sup>1</sup> 作者为苗族,1962年生,日本东京大学学术博士,日本学术振兴会(JSPS)博士后,现贵州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所长,贵州省人类学学会首任会长,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方向:近代国家与民族建构、族群认同、西南少数民族历史等。

<sup>2</sup> “西南”作为一个固有的地理名词,因不同历史时期或行政区划上的考虑,在范围上都有不同的界定,但无论何种划分法,云南、贵州省都包含在其中。本文所涉及的“西南”,主要基于文化地理空间将过去主要是少数民族分布的地区纳入其中,其范围包括现今云南、贵州全域以及相邻的湖南、四川、广西省区部分地域。



通道，是有其时代背景及现实原因的。首先，云南省在帝国疆域版图中控扼西南各国及边夷的战略地位日益重要，受到中原王朝的高度重视，而便捷的交通不仅可以有效地控制西南边陲，同时对维系与周边国家“朝贡关系”也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其次，唐宋以后中国政治中心东向和经济中心南移，宋时即有“苏常熟，天下足”之说，至明代则“湖广熟 天下足”谚语流传天下，<sup>[6]</sup>过去只是连接蜀地与云南交通的旧有驿道显然已难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第三，原有驿道陆路迂回险恶，水路湍急溺舟，是促使朝廷另辟蹊径的直接原因。新开通的连接湖广与云南的“东路”驿道，不仅地势相对平缓，上下均可通行无阻，且较原有驿道缩短路程近两千余里。<sup>[7]</sup>有明一代，在云南与内地间的多条交通线路中有两条最为重要：一条是从现云南的昆明经曲靖、沾益、经现贵州威宁、毕节、赤水抵四川的叙永、泸州的“西路”，另一条则为上述这条由昆明至常德的“东路”。<sup>[8]</sup>这两条线路均需穿越此前被视为“蛮荒之地”的贵州地域，但相比之下，“西路”至泸州后仍需乘船沿长江下行，既有水急船溺之虞，且沿江上溯极为困难，而“东路”一线水陆两路，上下均较平缓，故明代以后便成为连接内地与西南边陲往来的首选通道。<sup>[9] (p218-219)2</sup>

明朝建立初期，因云南省的重要战略地位，王朝政权把驿道交通建设放在首位。明初洪武十四（1381），明朝军队沿“辰沅至普安入滇东路”进军云南之际，就开始在沿线设堡守卫。<sup>3</sup>次年在剿灭盘踞云南的梁王势力后即谕令归顺的乌撒、乌蒙等各部土司“随其疆界远近开筑道路，各广十丈，准古法，以六十里为一驿。”<sup>4</sup>并在沿入滇驿道上陆续建立卫所。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在派兵征讨云南的第二年设立了省级军事机构“贵州都指挥使司”；洪武二十四年（1391），朱元璋又派遣官吏重修了湖广至云南的道路。<sup>5</sup>明成祖永乐十一年（1413），以镇压思州、思南土司叛乱为契机，析其地为八府、四州，正式建立了“贵州等处承宣布政使司”，由此贵州正式建省；这时，分布在贵州境内的卫所已有 18 卫之多，其后随着新建及行政区域的变迁，共有 30 卫、140 余所。伴随而来者，是大量汉民以军屯、民屯、商屯的形式移民西南，据统计，仅从明洪武十九年至二十一年间，明王朝就组织了十余次向云南的大规模增兵活动，前后移入云南的官兵达 27 万人，加上从军眷属共有 80 余万人。<sup>[10]</sup>而《滇粹》则载沐英进入云南之际，“携江南江西人民二百五十余万入滇”，其后又移湖广、江南居民八十余万实滇，迁南京人民三十余万入滇<sup>6</sup>。贵州建省前后约有 20 余万军队，近百万军事移民驻守在东西两线的入滇道路上。<sup>7</sup>这些卫所除原属湖广的五开及铜鼓卫外，都集中在驿道沿线。以下美国学者李中清所绘的明代西南地区卫所分布图就清晰地反映出这一分布趋势<sup>[11] (p104)</sup>。

<sup>1</sup> 开辟湖广至云南的“东路”驿道的原因，史载：“（至元）二十七年四月，四川行省备右丞耶律秃满答儿言：窃见乌蒙迤北土獠，水道险恶，覆坏船只。黎、雅站道，烟瘴生发，所过使臣艰难，人马死损。本省南接云南所管普安路见立马站，东建辰、沅、靖州站赤。已尝令总把孟皋，直抵云南、湖广两省立站。地界相视，得普安路迤东罗殿、贵州、葛龙，俱系归附蛮夷，隶属四川省管下，可以安立四站，以达江陵路。观其山势少通，道径平稳，又系出马去处，比之黎、雅、乌蒙驿路捷近两千里。（中略）中书参政刺真，参议哈答等具奏，且乞遣使诣云南、湖广行省，详度可否，然后施行，奉圣旨准。”“二十八年三月十七日，（中略）照得二十七年四川右丞耶律秃满答儿所言之事，并令撒里之都省钦依移咨各省施行”。

<sup>2</sup> 对于入滇各路的通行状况，明代商书《一统路程图记》载：“沅水无水大之阻，客货不时可往。川江水漫石没，船不能上，水大极险。云南客货，西路川江下而东路元江上，但水大不往西矣。东路无水大之阻，西路川江快，有放船之惊”。

<sup>3</sup> (民国)贵州通志·前事志，卷二[Z]。

<sup>4</sup> (明)太祖洪武实录，卷 141[Z]。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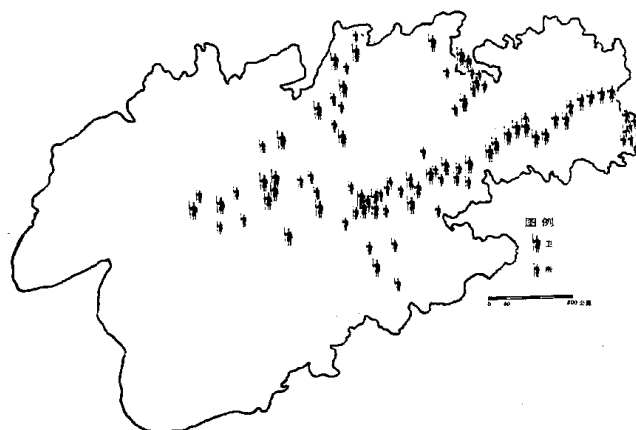
<sup>5</sup> (明)太祖洪武实录，卷 209[Z]。

<sup>6</sup> 滇粹·云南世守黔宁王沐英传略附后嗣十四世事略[Z]。

<sup>7</sup> 关于贵州卫所及屯军数量，因历史时期和统计方法不同而说法不一，有 24 卫、27 卫、30 卫等说，军队连同眷属数量也有从六、七十万人之说到百万人之说。参见古永续. 元明清时贵州地区的外来移民[J]. 贵州民族研究. 2003(01). 陈国安、史继忠. 试论明代贵州卫所[J], 贵州文史丛刊 1981, (06)等。



明代西南地区卫所分布示意图



从上图可以看出：明王朝在西南地区的卫所主要集中在三条连接云南与内地的驿道上，即昆明至成都的“清溪关道”（“建昌路”）；昆明至泸州的“西路”（“乌撒路”）；昆明至辰州、沅州的“东路”。其中由湖广通云南的“东路”沿线呈现出密集的线状布局，所以这条驿道在有明一代，亦称为“一线路”。“西路”与“东路”驿道在文献中亦有“官道”之称。因“西路”驿道因需从泸州沿长江上游上下往来，受湍急江流的影响，故事实上人员往来，如官员上任或进京述职、使臣朝觐、科举考试及经商等，大多选择“东路”驿道。然自云南曲靖至湖广辰州（沅陵）一线，所经过之处皆多系土司辖地或“生苗地界”，故明代常将这条驿道称为“一线路”。值得注意的是，此处所云之“一线路”，如“其地止借一线之路入滇，两岸皆苗”所言，更多是因周边不同的社会政治环境被赋予其意义的<sup>[12] (p325)</sup>。

从这一意义上看，可以说，“苗疆走廊”实系国家动用强大的军事政治力量，犹如在“异域”的丛林中开辟的一条政治、军事、经济及文化的空间，是左右整个西南边疆地区安危一条重要的“国家走廊”。明王朝之所以设置贵州行省，目的就是为保障由湖广入滇的这条驿道的安全。如此一国政府为一条交通线而建置一省级行政单位之举，不仅在世界历史上亦属罕见，并且也因此改变了中国西南地区地缘政治版图的格局，深刻地影响了沿线少数民族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sup>[12] (p333)</sup><sup>1</sup>。笔者在此仅以西南地区的“国家化”进程与“苗疆走廊”之关系，提出一些观点，以待方家指正。

## 二、

首先，就“苗疆走廊”与“改土归流”之关系而言，明代最早的“改土归流”地区始于洪武元年(1368)的广西忻城土司<sup>[13]</sup>，而贵州也是最早实施“改土归流”且最频繁的地区之一，而其范围则基本是沿驿道沿线展开的。此前有关西南的“土司制度”及“改土归流”的研究，学者们多关注边疆与中原王朝间政治关系发展，以及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对少数民族社会带来的影响等，然而对“改土归流”与保护驿道安全间的关系却甚少论及。明清时期，因长达千余公里的湘黔滇通道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故明初在贵州地域内的“改土归流”，事实上主要目的就是为维护这条驿道沿线安全与通畅。如在洪武十七年(1384)发生的“奢香事件”，其起因与结局均与驿道有关。其后洪武十八年(1385)废普定土府；<sup>2</sup>洪武二十二年(1389)废普安军民府，设普

<sup>1</sup> 如明人王士性对贵州建省与“东路”驿道间关系云：“西南万里滇中，滇自为一国，贵竹（贵州）线路，初本为滇之门户，后乃开设为省者，非得已也”。

<sup>2</sup> (明)太祖洪武实录·卷174[Z].



安军民指挥使司；<sup>1</sup>洪武二十三年（1390）废都匀安抚司，设都匀卫；<sup>2</sup>永乐十一年（1413）废思州、思南土司改设八府、四州，正式设置贵州行省<sup>3</sup>。万历年间，统治现贵州中部及北部已有八百多年历史的播州土司杨应龙叛乱，阻塞官道四出杀掠。明王朝动用数省兵力于万历二十七年（1600）将叛乱镇压下去，将其地析为遵义、平越二府，分属四川、贵州。上述“改土归流”，其原因虽系土司举罪或叛乱所致，而所辖地区皆系驿道必经之地，“苗夷犷悍，作梗衢路”，一旦发生叛乱，驿道阻断，即会危及整个西南边疆的安全。为保护这条通道的安全，朝廷一方面尽力剪除“一线路”周边的土司势力，同时对无土司管辖的“生苗地界”则不断用兵镇压。据不完全统计，元明清时期数百年间，“东路”驿道周边发生的战事达百余次以上，成为整个中华帝国的疆域范围内兵燹战乱最频繁的地区之一，以至在民间流传“三十年一小反，六十年一大反”之说。但总体上看，明代贵州建省以后，国家力量和汉族屯军、屯民及其文化的影响，仍局限在驿道沿线周边地区。因周边土司及少数民族势力强大，一旦驿道受阻，便会危及整个西南边陲的安定，故朝廷官员亦发出：“各省靡不四通八达，滇之受病，正以靠点一线耳”之感叹。<sup>4</sup>

就贵州省而言，尽管有大量的汉族屯军、屯民进入，但整个有明一代，国家力量基本上只能控制沿驿道沿线地区，形成一条狭长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的线性空间。明代在贵州的“改土归流”，其目的并非为扩展疆土而主要在于维持驿道之通畅。明代后期，沿线军户大量逃亡，驿道交通安全愈显脆弱，但朝廷仍倾力保障这条道路的安全而倾力维护。如天启元年（1621）爆发的“奢安之乱”，四川重庆、云南沾益、贵州安顺、普安、平坝、偏桥（施秉）、安南（晴隆）和湖广辰州（沅陵）、沅州（芷江）等驿道沿线卫所，先后被四川永宁土司奢崇明和水西土司安邦彦联手攻占，贵州境内的滇黔通道彻底被断绝。贵州城（贵阳）城内四十万人至解围时仅存二百余人。<sup>5</sup>此时，明王朝的统治已临近崩溃边缘，但朝廷仍将黔省叛乱与北方辽东战事置于同等重要位置，“天下有时急而人不得独缓，地重而人不得独轻者，最急莫如辽左（中略），其次莫如滇黔”<sup>6</sup>。至崇祯三年（1630），历时九年时间方将叛乱最终镇压下去。崇祯十一年（1638年），地理学家徐霞客游至贵州安顺、关岭一带，曾感叹道：“各州之地，俱半错卫屯，半沦苗孽，似非当时金瓯无缺矣。三卫之西（指普定卫、安庄卫、安南卫），为水西所苦。其东又诸苗杂据，唯中一通道行耳”<sup>7</sup>。至清代，满洲统治者统一全国后，西南地区早期基本上处在藩王吴三桂的控制之下。其后随着“三藩之乱”（1673-1681）的平定，康熙、雍正年间，王朝权力便展开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同时对无土司管辖的今湘西、黔东南及黔西南的“生苗”地区，则直接付诸军事手段“开辟苗疆”。这其中，对驿道交通安全的考量也成为促使清王朝展开上述措施的重要原因之一。如雍正二年（1724），云贵总督鄂尔泰将时任镇远知府的方显招至曲靖，询问应否开辟“苗疆”及方略时，方显力主开辟，其中一条主要的理由就是：“官民自黔之黔，自楚之黔、之粤，皆迂道远行（中略）。苗又时出界外，剽掠内地商旅，尤以为苦”。<sup>7</sup>征服“苗疆”后，清朝政府开通多条水陆交通线路，形成了以“苗疆走廊”为主线的交通网络体系。乾隆时期，由于贵州地域内已普遍设立郡县，加上内地人口剧增，大量汉族“客民”开始以流民的形式迁入“苗疆”，随着驿道沿线周边地区大量汉民的移入以及各民族社会汉化程度的加深，“一线路”之称亦不复

<sup>1</sup>（明）太祖洪武实录·卷 195[Z].

<sup>2</sup>（明）太祖洪武实录·卷 205[Z].

<sup>3</sup>（明）太祖洪武实录·卷 87[Z].

<sup>4</sup>（明）熹宗天启实录·卷 30[Z]. 类似记载也屡见于《明实录》中。如神宗万历实录·卷 432、万历三十五年四月条载：“云南孤悬天末，万里而遥，出入往来必由贵州。贵州在万山中，一线之路，蛮、峒、夷、獠出没其间，宦辙旅装，时遭劫掠，虽使命邮筒，往往阻绝。其为行路之难久矣。万一有警，或扼吭而闭其息，则滇中声援上下阻绝。”

<sup>5</sup>（明）熹宗天启实录·卷 26[Z].

<sup>6</sup>（明）熹宗天启实录·卷 30[Z].

<sup>7</sup>（清）方显. 平苗纪略[Z].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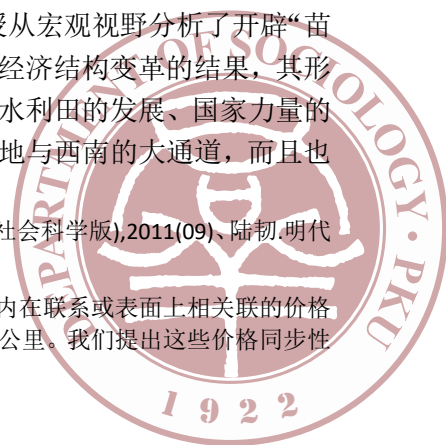
见，然其作为西南地区交通大动脉的地位，直到今天依然不可替代。

其次，从“苗疆走廊”对西南地区文化教育、城镇分布格局、经济市场等的影响看，中原王朝权力在西南地区将政治、军事力量集中于驿道沿线之分布格局，其影响必然会在社会经济及文化诸方面领域表现出来，并呈现出“国家化”影响下的整体性特征。此前在西南历史地理学、交通史和地方史研究中，一些学者就从不同角度关注到这条“东路”驿道的重要性。如杨永福在对西南古代交通变迁历史进行梳理过程中，认为元代开辟的由中庆(治今昆明)经贵州普安达黄平道路的开通，奠定了明清西南地区交通格局的基础，在当时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如导致移民活动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点；同时促进了相关地区经济的开发，其深度、广度均为前所未有的，成为这一时期滇川黔相连地区经济活动中活跃的部分，也奠定了明代贵州建省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西南边疆与中央关系的整合，加快了边疆与内地一体化的进程；<sup>[15]</sup>(P19-20)<sup>1</sup>李惟白从贵州民族音乐特点与驿道的关系分析了贵州民族音乐与汉文化之间的联系；<sup>[16]</sup>史继忠、陈国安等分析了驿道交通、卫所军屯对贵州建省的影响，认为明代以后位于西南腹地的贵州省的战略地位的提升，与其处在控扼西南地区乃至东南亚与中国间的交通枢纽位置有关；<sup>[17]</sup><sup>[18]</sup><sup>[19]</sup>钟铁军通过对贵州省驿道沿线“州卫同城”现象的分析，认为这其实是将“卫所”的军事职能与“郡邑”的民事职能合二为一，既促进了城镇本身的发展，又有益于加深对当地的统治；<sup>[20]</sup>汤芸、张原等进而梳理了贵州城镇的形成过程，认为贵州的城市化与城市体系系中央王朝在西南边陲进行政治军事拓展的产物，卫所城镇的生长和发育并不依赖于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而在于驿路通道的建设和早期国家化的经营程度。因此，明代贵州的城市体系既不是市场等级体系的派生物，也较难用一套规范的行政等级体系来辨别；<sup>[21]</sup>此外，“屯堡文化”研究专家孙兆霞教授则关注到国家政治、军事力量介入下建构起来的“通道文化”对促进贵州民族关系“一体多元”格局形成带来深刻影响；<sup>[22]</sup>在国外，美国经济史研究者李中清教授早在1980年代在就指出贵州正式建省，直接目的即是为了保障这条“东路”交通干线的畅通，明代贵州省政区治所和军队卫所大多沿着这条交通线设置；<sup>[23]</sup>他在所著《中国西南边疆的社会经济：1250—1850》一书中，从经济史角度将西南边疆的形成置于国家大一统格局视野下进行考察，详细探讨了驿道交通与贸易、人口与移民、粮食生产与土地开垦、粮食分配与价格变动等问题。所探讨的内容与明清时期的驿道交通布局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其中他就云南、贵州“某些区域”粮食价格变动保持高度“同步性”的见解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事实上指出了“苗疆走廊”对联动西南经济带来的影响。<sup>[11]</sup>(p250)<sup>2</sup>

可以看到，上述成果从不同的侧面涉及到了驿道交通对西南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带来的多层面的影响，也凸显出国家力量沿驿道交通对西南边疆地域及民族社会的全面渗透和影响。但这些研究大多还局限在个别的“问题意识”的领域，缺乏从更广阔视野下的整体性把握与探讨。自“苗疆走廊”概念提出以来，从以“驿道”连带起来的“空间”关系为切入点的相关研究初显端倪，如田书清通过对明清时代贵州籍进士分布地的统计和考察，认为“苗疆走廊”与贵州教育的发展关系重大，直接影响了明清进士的分布格局，八成以上的进士系沿“苗疆走廊”及其他三条线路呈带状分布，走廊带进士人数的变化也决定了整个贵州进士变迁的大致走向，体现了在明清社会主要交通驿道对沿途经济、社会及文化发展的巨大贡献。<sup>[24]</sup>曹端波教授从宏观视野分析了开辟“苗疆走廊”的背景，指出这条走廊是中国各民族长期互动及中国政治、经济结构变革的结果，其形成的原因具有多元性：如民族生态分布、西南贸易与市场、南方稻作水利田的发展、国家力量的渗入、西南的经济开发与移民等等；认为这条走廊不仅是连接中国内地与西南的大通道，而且也

<sup>1</sup> 相关论述另见方铁. 历代治边与云南的地缘政治关系[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1(09)、陆勃. 明代云南汉族移民定居区的分布与拓展[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3辑[C], 2006.

<sup>2</sup> 如李中清在分析云贵两省粮食价格变动联动性时指出：“我们可以设想有一条内在联系或表面上相关联的价格纽带存在于两省之间，从云南西部的永昌一直延伸到贵州的铜仁，长达一千多公里。我们提出这些价格同步性系数，目的是以其作为西南市场联系的证据。”



是西南与全球经济连接的纽带。<sup>[25]</sup>笔者也进而探讨了“贵州文化”主体性缺失与“苗疆走廊”间的关系。<sup>[26]</sup>上述研究从不同层面突显出“苗疆走廊”所具有的丰富的学术内涵和研究价值。纵观前近代时期中国疆域版图的变化过程,可以说,对西南边疆的政治经营及开发,是元明清时代构建帝国边疆体系的最重要内容之一。“苗疆走廊”作为西南地区最重要的“国家走廊”,其宏大的“国家叙事”不仅在“中心与边缘”或“内地与边疆”等结构关系上有所表现,并且在地方性叙事及一些局部领域:如城镇格局、城市空间布局、教育、商品流通与市场圈、集市贸易、农业技术推广或新品种(如玉米、番薯等)传入等,都会带上了浓郁的“国家化”色彩,并且通过深入的探讨与研究,也会更加理解中国传统政治结构中“一体多元”的丰富内涵及其历史形成的过程。

第三,从“苗疆走廊”对西南民族·族群社会文化及族群关系的影响看,贵州在建省前,“西路”驿道穿越现今贵州西部及西北部,系芒部、水西等土司统辖的腹地;“东路”驿道千余公里的漫长道路则分属川、滇、湖广三省。其所经地域由西向东,驿道一线以北分别为水西土司、播州土司、思州、思南土司控制的地区,东段的辰州(沅陵)、沅州(芷江)以北腊尔山及周边地区则是“红苗”等“生苗”盘踞地带;驿道一线以南地域除部分地区有土司管辖外,大部为“化外之地”的“生苗地界”。自元代开通此路后,当地土司与少数民族就反抗不断,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元朝大德五年(1301)土官宋隆济为反抗朝廷征兵发动的叛乱,这次叛乱致使前往征讨八百媳妇国的元军在八番顺元(今贵阳附近)一带溃散而不得不罢征。<sup>1</sup>明王朝建立后,“苗疆走廊”沿线地区的各种叛乱和反抗一直持续不断,贯穿了整个明王朝统治时期。如洪武十一年(1378),在贵州东部爆发的“峒蛮”(现侗族)吴勉领导的叛乱,朝廷动用十万之众,历时八年方将其镇压。在倾力镇压各民族社会的叛乱同时,王朝权力也采取各种措施保护驿道的安全,嘉靖年间(1522-1566)在现湘西凤凰县一带修筑的边墙,即面向驿道呈U形结构延绵近二三百公里,其目的就是为防止现湘西及黔东北一带的“生苗”南下侵扰抢掠行商<sup>[27]</sup>(p336-347)。明中期以后军户逃亡严重,道路状况更为险恶,甚至出现卫所屯军与苗民勾结抢掠行商及“汉变苗”之现象。<sup>2</sup>“贵州一线路外即苗穴矣,即苗即贼,不窥吾路,则窥吾城。”<sup>3</sup>因驿道所经之地尽可能选择的是平坦易行之处,所以首当其冲起来反抗,并受到汉文化深刻影响的也是这些族群。如洪武年间镇压了上述“峒蛮”吴勉的叛乱后,明王朝在今之黎平、锦屏等地设置开屯设卫,在镇远府与黎平府间形成一条南北宽40公里,东西长60公里的汉民分布区,以“苗疆走廊”为界将侗族社会隔成南北两部分,导致北部侗族社会受汉化程度深而与南部侗族在文化上呈现出明显的差距,形成了南侗与北侗两个方言区。<sup>[28]</sup><sup>4</sup>明代迁入贵州的汉族屯军及屯民,也经历了数百年的剧烈社会变迁过程,除西部保留一部分“屯堡人”、“穿青人”外,东部镇远、偏桥(施秉)一带的屯军则选择另一种生存战略,基本上融入到了当地的苗族中。据调查,现施秉一带屯军的后代还流传有许多

<sup>1</sup> (清)乾隆,《贵州通志·师旅考》,卷23[Z]。另见(元)招捕总录[Z],宋隆济条。

<sup>2</sup> 军户逃亡现象从洪武年间就见诸记载,其后更为严重。屯军“变苗”并联手劫掠驿道行商之事也屡见于文献。如(明)世宗嘉靖实录·卷87[Z],嘉靖七年四月条载:“兵部覆贵州巡抚袁宗儒所条三事,一议处舍余以济军数,谓贵州原额军士逃亡者多,宜将各卫所舍余,不拘疏远傍枝,但愿从军者,审果精壮即收伍,食粮以备操练;一抽余丁以益军伍,谓军士生息日蕃,投苗助乱往往有之”。(明)熹宗天启实录·卷9[Z],天启元年九月条载:“刑部右侍郎邹元标言,黔患不尽在苗,其为道路梗者,苗十之三耳,播弄尚有数端,一曰马店户,凡自楚入黔者,必由沅州、晃州、清浪、平溪、镇远而上,由滇入楚者,必由平夷、亦资孔、普安州、安南、新兴而下,辐重若干。马户店户尽在阿堵中,客未起程,线索先通,节节位置,未有能出其彀中者。出劫于道,则有浙江、江西、川湖流离及市鱼盐瓜果为生者,攘入其中,久之化而为苗,苗倚为命,弄兵徂诈,多出其乎”。(明)熹宗天启实录·卷74[Z],天启六年十二月条载:“先是黔之应卫所者,即有卫所,应营哨者,即有营哨,故御苗有人,道途无梗。迨法弛而营哨无人。苗之出劫,率皆穷军为之前导,不惟苗毒民,而民亦化为苗矣”。

<sup>3</sup> 郭子章,《万历黔记·卷一》[Z]。

<sup>4</sup> 另笔者曾向龙耀宏教授等侗族学者请教过侗语南北方言分布区域等问题,他们均认可“东路”驿道是划分南北方言基本界线。



口头传承，其中就有“苗族打来了变苗人，汉族打来了变汉人”之说。清代初期，由于战乱和逃亡，康熙二十四年（1685）贵州全省的在籍人口仅有万余人，但到乾隆晚期，全省人口徒增至500余万人，其中大部分人口系以“流民”的方式迁来的汉族“客民”。<sup>[29]</sup>乾隆年间以后，贵州全省除一些小土司外，基本全部改设为府州厅县制。在这种状况下，少数民族社会中普遍出现了汉化现象。正如以下将讨论的那样，西南地区自清代中期以后由“国家化”向“内地化”急剧转向过程中，各非汉族群社会依汉化程度的高低开始构建新的族群认同“边界”。甚至明代汉族移民的后裔“屯堡人”、“南京人”、“穿青人”等也被后来的汉族归为“苗类”，饱受歧视。现今中国有73万“待识别民族”，其中71万人分布于“苗疆走廊”沿线及周边地区，占全国总数的96%以上。<sup>[30][31]</sup>由此可见，经历六百年沧桑巨变的“苗疆走廊”沿线，族群间的互动关系极为复杂，城乡区别（如“穿青人”与“屯堡人”）、先来与后到（如明代移民与清代移民）、被视为“同一民族”的内部差异（如苗族与东家、西家及革家等）、受汉化程度的高低（如侗族、布依族与苗族等）等都会造就新的族际认同的“边界”，并进而影响到今天。

### 三、

自元代统一云南后，尤其是明清时代，西南边疆地区被纳入中华帝国体系的整合过程，其“国家化”及“内地化”两者在这里交相重叠，而首当其冲者即“苗疆走廊”沿线周边的地域及民族社会。从这一意义上看，“苗疆走廊”可谓为一条对西南国家整合影响至深的“国家走廊”。

所谓的“国家化”，在前近代时期主要指的是中原王朝在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自上而下地对边疆地区进行控制的“一体化”整合过程。<sup>2</sup>此前，学者对西南边疆地区纳入王朝体系过程的研究多使用“内地化”这一概念。然而，“内地化”与“国家化”在内涵上虽有若干重叠，但却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前近代时期的“国家化”主要表现为国家权力对边疆地区有意识的控制，以及为实现这一目标推行的一整套政治军事经济措施、教育礼仪制度及文化行为，而“内地化”则主要指的是边疆与内地在“同质化”演绎过程中，基层社会自下而上地对王朝政治体系及意识形态在心理认同上的趋同过程，而这往往与汉族移民的大规模流动有密切的关系。就“国家化”之内涵而言，笔者认为，它主要包含了“王化”与“教化”这两个不同层面：“王化”主要指中原王朝直接和间接统治的空间范围，构成了帝国模糊的政治空间及“疆域”范围。而“教化”则既是指文化边界，即以汉字和具有普世价值的儒家的“礼”等伦理观为代表的汉文化，同时也形成了以汉族为主要分布地的边界明晰的“内地”区域。在中华帝国政治次序向心式的差序结构中，尽管政治或文化的“边界”时隐时显，模糊而流变，但这两条“边界”无疑是存在并且具有各自不同的内涵。历史上中原王朝统治对边疆地区的整合，往往先是以“王化”确立其模糊的政治“疆域”空间，再通过“教化”徐徐扩展其明晰的“版图”范围。换言之，由“天下观”彰显出的传统“大一统”思想，其政治秩序与意识形态既建构在“文明”与“野蛮”对置的“华夷之辨”基础上，但同时其疆域范围内又包容不同生态、不同文化的族群在内，形成了政治上“华·夷”

<sup>1</sup> 贵州省境内的“待识别民族”中大多相对集中在“苗疆走廊”沿线的两个区域，即西部主要分布于安顺、郎岱、平坝至毕节一带，东部则分布在凯里、黄平、麻江、施秉等地，其背景及原因尚有待今后的调查研究。关于1980年代贵州进行“民族识别”和“待识别民族”的情况，另见严奇岩：《贵州未识别民族人口的分布特点和历史成因》，《民办教育研究》2009年第2期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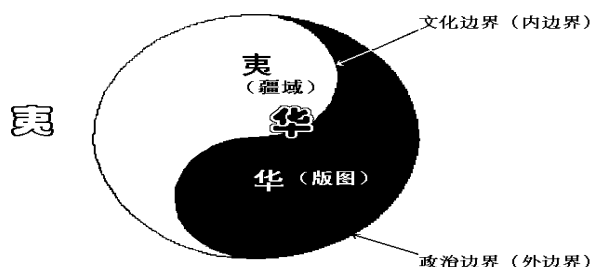
<sup>2</sup> 现“国家化”概念大多用于近代国民国家的语境下，如“军队国家化”、“会计国家化”等等，对前近代“国家化”的研究，仅有少数学者涉及，学理上大多也没有对这一概念的内涵进行清晰的界定。参见蒙爱军：《国家化进程中的水族传统宗族社会[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05）。章毅：《清代中前期浙南移民的国家化与本地化——以石仓祠庙为中心[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03）。牟发松：《国家对社会的顺应和社会的国家化——汉唐历史变迁中社会与国家关系及其变动的基本特征[J]》，社会科学，2010年，（07）。等。





共生的“一体”与文化上和而不同的“多元”形态。所以说，“一体多元”本身就是传统中华帝国统治体系中最基本的结构，其关系可参见以下笔者草拟的示意图。

中华帝国双重“华夷体系”图



从上图也可看到，在传统的，处在统一状态下的中华帝国的统辖地域中，事实上一直存在着两条时有重叠但又不同的“边界”：“政治边界”也可称之为“外边界”，其边界线模糊而富有伸缩性，形成了帝国广阔的“疆域”范围；相比之下，“文化边界”明晰而相对稳定，可称之为一条“内边界”，这条“内边界”线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族群关系上具有多重含义，它域内的“内地”即是直接为帝国提供政治、军事、经济资源支持的“版图”范围<sup>1</sup>。每当中原王朝势力强盛之时，往往通过武力征服、羁縻制度、朝贡关系等手段，可以把“外边界”范围扩展得很大，形成“政治一体”和“文化多元”的广阔空间；然而当中原王朝势力衰弱之时，则“外边界”范围不断收缩，有时甚至退至“内边界”以内。从这一意义上可以说，近代以前，中华帝国及其文明之所以数千年来延绵不绝，相当程度上正得益于这一极富于弹性的统治体系。

回顾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自秦汉开辟“五尺道”、征服“西南夷”以来，中原王朝对西南边疆地区的“国家化”就一直在持续进行，除了时断时续的政治统属关系外，文化上的“教化”也成为中原王朝输出“软实力”，实施政治影响的重要手段。如唐代在成都设立的为南诏贵族子弟就学的专门学校，元明清时期将土司子弟送入官学学习汉文及儒家思想的制度等。这些由国家权力自上而下推进的“教化”措施，虽然在“华夷”畛域区分层面上尚有诸多限制（如禁止土司子弟参与科举考试、禁止土官转任流官等），从而将土司最终排除于如同安德森在其《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所言的王朝体系的“巡礼圈”外，但其影响仍然是显而易见的。以“苗疆走廊”周边地域为例，凡是土司统治的地区，在经过“改土归流”后，大多很快融入到内地的府、州、县体制内，相比之下，一些“无君无长”的“生苗地界”，如黔东南、黔东南、黔西南等地，王朝权力采用军事征服手段“开辟苗疆”后，反而还需要在一些地区重新设立小土司进行统治。直到今天，贵州省的三个少数民族自治州及湖南湘西苗族土家族自治州在明清时代均系“生苗”分布地域。这从另一方面也说明“土司制度”对促进西南地区的“国家化”进程所具有的积极作用。以往对于“土司制度”的研究，学者多强调“土司制度”之野蛮落后，并由此引申出“改土归流”的必要性及进步意义，而对这一制度背后所隐含的间接“国家化”过程却未给予充分的关注。

在探讨西南边疆地区的“国家化”问题之际，最值得关注的是明代以后汉族移民大规模进入

<sup>1</sup> “内边界”（internal boundary）一语现在国内学界中多用于气象、环境等自然科学领域。此前笔者与相关学者就西南边疆问题的讨论中，曾使用“内地化边疆”一语阐述相关观点，对此青岛大学杜靖教授指出应与近期国际学术界提出的“内边疆”或“内边界”（inner margins）概念对接，惜笔者学识浅陋，尚未看到相关著述内容，故仅在此根据本文内容借用，特在此说明并鸣谢杜靖教授。

西南，使得“内”“外”两条边界开始在这一区域发生交织，呈现出极为复杂的状况。首先，汉民的移入为王朝权力实施“改土归流”，推行郡县制奠定了必要的政治、经济及文化基础。而王朝权力直接控制的重点也是在汉族军屯、民屯集中分布的驿道沿线地区并逐渐向四周扩散；其次，官学、义学的设置和科举考试等，也成为自上而下地推行的“国家化”措施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些最初大体上也是驿道线展开的<sup>[241]</sup>。第三，依托驿道沿线推进的“国家化”进程，尤以贵州省为明显。整个明代，汉族移民，以及中原王朝的政治军事力量均主要沿东西两路驿道尤其是东路的“一线路”沿线分布，并形成了贵州最初的城市群，而与之相应的市场圈的扩展及贸易往来，在空间上也呈现出明显的带状分布格局。可以说，至少在清代中期内地汉民向西南大规模自发移民以前，西南边疆地区纳入王朝国家体系的过程，主要是由国家力量自上而下地进行推动的。大量以组织方式移入的汉民进入西南地区，使得帝国的双重“华夷体系”结构的两条边界在此交汇重叠，社会也由此进入了剧烈的动荡时期。因中原王朝主要经营重点放在云南，而贵州的设置主要是为保障通往云南的这条“东路”驿道的安全为主要目的，移入的汉民主要分布在驿道沿线地区。明清统一中国后，从康熙至雍正年间在西南展开的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及“开辟苗疆”，迎来了西南“国家化”的最高峰期。乾隆时期随着内地人口的猛烈增长，大量汉族移民以自由移动的方式流入西南地区，人口构成也由“夷多汉少”变为“汉多夷少”，这种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乾隆中期开始便开始了急剧的“内地化”进程。

“内地化”一语最初系1970年代台湾学者在研究台湾汉族移民历史的过程中提出的概念。它主要是指汉族移民台湾后，在文化和心理认同上与大陆内地趋同过程，从而使台湾完成由“化外之地”向“中国”的转变，所以亦将“内地化”等同于“中国化”。<sup>[32]</sup><sup>2</sup>上述的“国家化”概念之所以不等同于“内地化”，主要在于国家力量对边疆地区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的整合并不能直接导致“内地化”。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传统王朝体系中，“版图”是对王朝统治范围的清晰表述，而“疆域”则是“王化”理念的泛化表现。<sup>[33]</sup>支撑王朝政权经济基础的是其版图范围，其对边疆地区的统治，在政治及经济资源上的付出往往远大于所获，对此李中清教授在他对西南社会经济历史的卓越研究中曾有过精辟的论述。<sup>[11] (p34-58)</sup>而历史上“疆域”向“版图”递变，又往往与汉族移民——即受“王化”与“教化”思想的驯化，作为其观念的载体并为王朝政权纳税服役的人群之移动有关。从这一意义上看，正是由于明清时代大量汉族移民的进入，才使西南边疆地区真正被纳入到中原王朝的“版图”或“内地”范围，但这一过程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岁月。

明清时期，云南与贵州虽被列入行省之列，其境内的少数民族地区大多也处于王朝权力直接或间接控制之下，然明王朝有关“中国”的表述中，显然指的是直接控制府、州、县及汉人分布地区。而在国家组织下移入的汉族移民主要是沿驿道线分布，周边既有土司、熟苗，也有不服王化的“生苗地界”分布其间，致使空间上中华帝国的多重“华夷”边界在此交汇重叠，情况极为复杂。如明洪武年间朝廷在制定藩国朝贡礼仪之际，将云贵行省内的土司、土官与日本、朝鲜等同列：“其蕃国使臣及土官朝贡皆如常朝仪”。<sup>3</sup>贵州黔东南、湖南湘西等“生苗地界”则被视为“化外之地”，成为在周边行省包围下的边疆地区。到清代，在西南地区“内地化”推进过程中，这种现象依然存在。可以说，有明一代，大量进入西南地区的汉族移民是自上而下的“国家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贵州“苗疆走廊”沿线一带，国家力量和汉文化在周边强大的土司和少数民族势力压迫下，反而呈现逐渐萎缩之势。清朝统一中国后，康熙、雍正年间在西南地

<sup>1</sup> 以明清时期贵州省的科举考试为例，据田书清统计，从明正统四年（1439）至清光绪三十年（1904）近500年间，贵州籍的科举进士有718人，这其中有85%的进士来自驿道沿线的府、州、县，而大部又集中在“东路”沿线地区，如果时期仅限于明代，这一趋势则应更为明显。

<sup>2</sup> 国内学界较早将“内地化”概念引入边疆民族研究的成果为杜常顺，“论清代青海东部地区的行政变革与地方民族社会”，《民族研究》2011年第2期。文中对清朝政权在青海省“番汉交界”地区推行一系列行政建置、教育措施以及汉族移民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将青海民族地区纳入王朝体系的过程视为“内地化”。

<sup>3</sup> 《明太祖洪武实录·卷232[Z]》。



区展开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和“开辟苗疆”，普遍推行府、州（厅）、县之建置，为西南边疆地区的“内地化”奠定了政治基础。

对西南边疆地区“内地化”过程的研究，目前尚论者寥寥，随着今后研究的推进，将具有十分广阔的研究空间和丰富多样的内容。然笔者认为，西南地区的“内地化”与此前台湾学者所界定的“内地化”，其内涵应有所不同。首先，云南、贵州本身就是中华帝国的行省之一，其“国家化”在先，“内地化”紧随其后并交错展开。因迁移至此的汉族移民在心理上并不存在“中国化”之认同障碍，“内地化”实质上是汉文化作为主流话语的构建和展开之过程、以及强势国家权力和汉文化对周边少数民族社会的影响所导致的普遍同化现象。其次，西南地区的“内地化”更多的是指来自少数民族社会对王朝政治体系和汉文化的认知及趋同现象和过程。在强大的外界压力下，各非汉族群（少数民族）社会不仅在政治、经济及文化上等深受影响，并且在强势族群一侧的文化语境中形成的“异族”镜像以及“华夷之辨”等结构性观念都会内化到他们群体意识中，并在这一“他者”的坐标轴上“自下而上”地依照汉化程度的高低建构起新的族群边界和认同，这就是笔者曾提出的“他者性”理论思考<sup>1</sup>。第三，“苗”作为中国南方、尤其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泛称，“苗疆”作为中华帝国统治疆域中的最重要地缘政治概念之一，均滥觞于“苗疆走廊”并扩展至周边地域；其流变过程与明清时期西南地区“国家化”和“内地化”进程有着重要的内在关联。对此因篇幅所限，笔者将另行撰文阐述。

#### 四、

在当今学术界，受法国年鉴学派和地理学的影响，学者们对于区域社会历史文化的多样性及其特质给予了不少关注。然而问题在于，过于强调地域、区域及民族社会的个性和多样性特征而忽视强大中央集权政治下由国家力量带来的普遍性文化表征，亦使人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感。对此一些研究华南汉族社会的人类学者也曾提出过类似的疑问。<sup>[34] (p82)</sup> 回顾明清时代西南边疆地区的地域及民族社会变迁的历史，可以看到，如果脱离了宏大的“国家叙事”之框架，便无法把握隐含在地方文化多样性背后的普遍性要素及整体性的因果关联。对此笔者拟提出以下几点看法供方家指正：

首先，元明清时代，是中国西南地区纳入中华帝国体系的重要历史时期，以云南及贵州为中心的西南边疆，经历了由“疆域”向“版图”，从“边疆”到“腹地”的巨大转变。自元代统一云南直至明清时代，中华帝国双重“华夷”边界开始在此交汇，因此这一区域内的地域及民族社会的历史文化变迁，其特点也主要表现为中原王朝凭借强大的国家力量，自上而下地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对边疆地区展开的一系列“国家化”整合过程；但“国家化”只是实现“内地化”前提和基础，两者可交叉但并不等同。就云南与贵州而言，贵州因其处在保障云南安全的附属地位，其“内地化”进程是在清朝中期以后大量汉族“客民”流入后才真正开始的。

其次，因受西南地区复杂地理形势的影响，交通状况往往成为制约王朝权力统治力度强弱的最重要因素。因此对交通驿道的研究，只停留在历史地理及交通史研究上远远不够。从这一意义上说，“苗疆走廊”的开辟，因其将湖广内地与云南边疆牵一线以勾连，成为左右王朝权力在西南边疆地区统治稳固最重要的一条通道，可谓为真正的“国家走廊”。它不仅对维护云南边疆地

<sup>1</sup> 清朝后期，在汉文化的强烈影响下，一些与汉族交往比较频繁的少数民族，如“仲家”（布依族）、“峒苗”（侗族）等社会的群体意识中普遍出现了否认自身为“苗”的现象，笔者称之为“非苗化”现象。参见拙文《前近代时期的族群边界与认同——对清代“苗疆”社会中“非苗化”现象的思考》，《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5期。另有关族群建构中的“他者性”问题，参见拙文，“从‘苗’到‘苗族’——兼论近代民族集团形成的‘他者性’问题”，《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From Miao to Miaozi-- Alterity in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Ethnic Groups”，Vol. 10, *HMONG STUDIES JOURNAL*, Published at Dec. 2009, USA.



区的政治稳定和促进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间的交流有重要作用，也直接促成了贵州的建省，并对其所经区域内的民族关系、民族/族群文化、城镇群落及经济圈等均产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影响。今后应从多学科视野对“苗疆走廊”沿线展开深入调查和全方位的研究。这样做，既可从国家整合的高度认识中国西南民族地区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历史进程，同时也有利于加深理解各民族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分布现状及形成机制，有利于构建基于地域空间的文化整体认同，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鲜活的案例及理论支撑。此外，把“苗疆走廊”周边地域的多样性文化置于一个在因果链条串联起来的整体空间维度下重新审视，不仅在学术上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在现实应用方面也可作为西南地区的文化遗产保护及文化产业发展提供新的视野和契机。

第三，历史上曾系“苗疆腹地”的贵州省，此前多被排除在边疆学研究领域外，某种程度上也限制了学者的视野。事实上，贵州省内的诸少数民族分布的地域，直到清朝早期仍然处在既无国家统治力量进入，亦无土司管辖的“化外之地”，形成了在周边内地包围下的一小块“内地化边疆”。如民国年间编写的《清史稿》中依然把贵州东部与湖南湘西交界的“苗疆”地区纳入到“中国边防”范围内。<sup>1</sup>“苗疆走廊”的开辟对西南地区纳入中国疆域版图的过程既有着重要作用，同时其域内“边疆”与“内地”曾长期交错共存的现象，对从动态角度把握中国疆域版图变迁的空间关系及过程，拓展中国边疆学研究的视野也将具有积极推动作用<sup>[2]</sup>。

#### 参考文献：

- [1]杨志强、赵旭东、曹端波，重返“古苗疆走廊”——西南地区、民族研究及文化产业发展新视阈[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2,(02).
- [2]曾江，“古苗疆走廊”拓展边疆理论[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04.27,(01).
- [3]王小梅，重构“古苗疆走廊”[N],贵州日报、2012.05.04,(16).
- [4]王小梅，搁浅在时光深处的“古苗疆走廊”[N],贵州日报、2012,06,01,(16).
- [5]龙晔生，“古苗疆走廊”研究及现实启示[J],民族论坛.2012,(05).
- [6]张建民，“湖广熟 天下足”述论——兼及明清时期长江沿岸的米粮流通[J].中国农史,1987,(04)
- [7]（元）经世大典·站赤考[Z],云南史料丛刊[C],第七辑，云南大学历史系民族历史研究室编.P172-173.
- [8]方铁，唐宋元明清的治边方略与云南通道变迁[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01).
- [9]杨正泰，《明代驿站考》附：（明）一统路程图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 [10]陆韧，明代汉族移民定居区的分布于拓展[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C],2006,第3辑
- [11]李中清著，林文勋、秦树才译，《中国西南边疆的社会经济：1250—1850》，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12]（明）王士性著，周振鹤点校.《五岳游草·广志绎》，北京：中华书局,2006.
- [13]蓝武，明代广西地区改土归流的多重性特征[J].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1,(02)
- [14]（明）徐弘祖，《徐霞客游记》，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
- [15]杨永福，滇川黔地区古代交通的变迁及其影响[D].云南大学博士论文，2011.
- [16]李惟白，试谈贵州少数民族音乐形成的特点[J].贵州民族研究,1985,(01).
- [17]陈国安、史继忠，试论明代贵州卫所[J].贵州文史丛刊,1981,(03).
- [18]史继忠，贵州置省的历史意义[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7,(03).
- [19]史继忠，驿道提升贵州战略地位[J].当代贵州,2011,(10).

<sup>1</sup>《清史稿》志120载：“中国边防，东则三省，北则蒙边，西则新、甘、川、藏，南则粤、湘、滇、黔，而沿边台卡，亦内外兼顾，盖边防与国防并重焉。兹分述之：曰东三省，曰甘肃，曰四川，曰云南，曰广东，曰广西，曰蒙古，附直隶、山西，蒙边防务，曰新疆，曰西藏，曰苗疆，曰沿边墩台、卡伦、鄂博、碉堡。”“苗疆当贵州、湖南之境，叛服靡常，历朝皆剿抚兼施。”



- [20]钟铁军, 释明代贵州之州卫同城[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C]. 2004, (04).
- [21]汤芸、张原、张建, 从明代贵州的卫所城镇看贵州城市体系的形成机理[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9, (10).
- [22]孙兆霞、金燕, “通道”与贵州明清时期民族关系的建构与反思[J]. 思想战线, 2010, (03).
- [23]李中清, 明清时期中国西南的经济增长和人口发展[J]. 清史论丛, 1984, 第5辑.
- [24]田书清, 古苗疆走廊与贵州教育的关系——基于明、清进士分布的统计分析[J]. 贵州社会科学, 2013, (01).
- [25]曹端波, 国家、族群与民族走廊——“古苗疆走廊”的形成及其影响[J]. 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 (05).
- [26]杨志强, 文化建构、认同与“古苗疆走廊”[J]. 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 (06).
- [27]黄才贵, 《贵州民族文化论丛》,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9.
- [28]龙耀宏、郎雅娟, 明清时期汉文化影响下的侗族南北文化差异[J]. 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 2011, (01).
- [29]梁方仲, 《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 [30]贵州民族识别资料集(内部发行)[Z]. 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 1-12集.
- [31]严奇岩, 贵州未识别民族人口的分布特点和历史成因[J]. 民办教育研究, 2009, (02).
- [32]伊全海, 移民与台湾“内地化”[J]. 寻根, 2006, (06).
- [33]毕奥南, 历史语境中的王朝中国疆域概念辨析——以天下、四海、中国、疆域、版图为例[J].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06, (02).
- [34]王铭铭, 明清时代的区位、行政与地域崇拜——来自闽南的个案研究[J]. 空间·记忆·社会转型: “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C]. 杨念群编,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 【论 文】

### 重返“苗疆走廊”

——西南地域、民族研究与文化产业发展新视域<sup>1</sup>

杨志强<sup>2</sup>

**内容提要:**元明时期新开辟的从湖广经贵州通往云南的“东路”驿道, 不仅是维系内地与西南边陲往来的主要交通命脉, 并且也直接影响了明清时期西南边疆地区政治版图的变化。本文首次提出了“苗疆走廊”这一概念, 初步探讨了这条走廊对贵州省的建省、明清时代“苗疆”地区的“国家化”过程以及民族关系等所带来的影响, 并对“苗疆走廊”的地域及族群文化的特点等进行了初步的整理和分析。就今后推进“苗疆走廊”作为“世界文化线路遗产”申报的可能性问题也提出了初步的看法。

**关键词:** 苗疆走廊 贵州建省 国家化 文化线路

#### 一、

<sup>1</sup> 本文初刊载于《三苗网》, 其后以联署形式载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2年第2期。

<sup>2</sup> 作者为苗族, 日本东京大学学术博士、日本学术振兴会博士后, 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教授。



大约在一百多年前的1902年至1903年间,日本著名学者鸟居龙藏,只身来到中国西南地区,进行了一次影响深远的田野调查之旅。回国后,他于1906年出版了《苗族调查报告》,1926年,又出版了《从人类学上看西南中国》一书。在后一本书中,鸟居龙藏以日志的形式,记录了他从湖南经过贵州至云南,再辗转到四川进行调查途中的一路所见所闻。在这本著作中,鸟居龙藏对一路所见的西南非汉族群,如“黑苗”、“花苗”、“罗罗”(彝族)等的体质特征和风俗等都仔细进行观察并作了详尽的描述。除此之外,他还对途中所经之处看到的各地城镇的状况以及在驿道上邂逅的商队、下宿的官方旅馆“行台”等情形均有叙述并留下了大量珍贵的照片。这些对我们了解百年西南地区的民族分布及各地社会状况显得弥足珍贵。<sup>1</sup>

上述鸟居氏进入西南展开的人类学调查之旅,其所行路线都是过去连接内地与西南边陲云南的驿道,这其中尤其是从湖南经贵州进入云南一路所走的路线,正是元明时期以后方开辟的一条连接中原与西南边陲的最重要的交通命脉。可以说,从元明时代以来直到晚清的数百年间,这条驿道一直是维系西南与中原之间政治、经济及文化联系的大动脉。它起于湖南洞庭湖畔的常德,沿水陆两路溯长江支流的沅江而上,经桃源、辰州(沅陵)、沅州(芷江)、晃州(新晃)等地,进入贵州境内;过平溪(玉屏),然后在镇远改行陆路,经偏桥(施秉)、兴隆(黄平)、清平(凯里)、平越(福泉)、新添(贵定)、龙里、贵州(贵阳)、威清(清镇)、平坝、安顺、普定、关索岭(关岭)、安庄(镇宁)、安南(晴隆)、普安等地入云南,再经平夷(富源)、沾益、曲靖、马龙、杨林(嵩明)至云南府(昆明)。按明代隆庆年间(1567年-1572年)刊印的商书《一统路程图记》中所载驿站间里程数计算,从常德至昆明间的里程全长约2600里(1400公里)长。如按文献记录中常以“辰、沅、普安东路”来泛指此路,即以辰州(沅陵)为该驿道之起点计算的话,其总长度约2300里,即1150公里长。这其中,经过现今湖南省境内的路段约有670里,贵州路段约1180里,云南省境内约450里。<sup>2</sup>

自元代统一西南后,云南省因其重要的战略地理位置,又是扼守西南边陲的桥头堡,故成为王朝政权的重点经营的地区之一。据研究,这时期有多条从内地入滇的驿道,其后形成了最重要的有两条通道:一是自泸州经乌撒(威宁)、毕节至中庆道(昆明),即从四川省泸州经叙永入云南省的威信,再经贵州省的毕节入云南宣威、曲靖、马龙等至昆明,文献中亦称为入滇“西路”。二是自湖广辰(州)、沅(州)经普安至中庆道;元代至元二十八年(1291)开通此道,走向是自湖南沅陵入贵州镇远,经黄平、贵阳、安顺、普安、盘县入云南曲靖等地至昆明。<sup>3</sup>这条驿道在文献中亦称为湖广入滇之“东路”。因这条驿道所经之地为各行省之间交叉的边缘模糊地带,加上沿线周边多是土司控制或非汉族群分布的区域,驿道就犹如一条孤线将湖广与云南勾连起来,故明代以后的文献中又常冠以“一线路”之称。

明初,将元代在现今贵州省内设立的“八番顺元宣慰使司”改为“贵州宣慰使司”,其地分属在湖广、四川、云南三省辖区内,或为大姓土司及众多小土司所控制,或为完全摆脱土司和朝廷控制的“化外”之“生苗地界”。如现贵州省西北部直至中部的大片地区为彝族的安氏土司的地盘;北部现遵义地区为播州土司之辖地,东部及东北部地区为思州及思南土司控制,而分属于

<sup>1</sup> 鸟居龙藏:《人类学上より見たる西南支那》、富山房大正十五年(1926)。原书为文言文,1980年日本学者将此书文言文改写为日语现代文,以《中国少数民族地区行记》之书名重版。现笔者正翻译注释此书,并获教育部2010年人文社会科学后期项目资助,预定商务出版社2018年上半年出版。

<sup>2</sup> 杨正泰:《明代驿站考》附录《一统路程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11-212页。另:明代里程长度沿唐制,每“里”约合为今天的570米。以上里程数为笔者按照《一统路程图记》中所载驿站间里程数算出。此外,按明人王士性《广志绎》载:“晃州(今湖南新晃)至平夷(今云南富民)十八站,每站虽云五六十里,实百里而遥。士夫商旅纵有急,止可一日一站,破站则无宿地矣。”故实际里程数可能多于上述统计,正确里程尚有待今后的实地调查。

<sup>3</sup> 方铁:“唐宋元明清的治边方略与云南通道变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1期。





珠江和长江流域上游水系的都柳江和清水江之间，即现今的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范围内则为“生苗”盘踞的地带，黔南和黔西南一部则为广西泗城土司控制，或为“生苗地界”。明初为征服云南省梁王的割据势力，朱元璋派傅有德等率三十余万大军，于洪武十四年（1381）分道从泸州经乌撒的“西路”及湖广辰州、沅州经黄平至普定（安顺）的“东路”道进军云南。平定云南后，朱元璋深忧安氏、乌撒、乌蒙、芒部等各地土司叛服不常，阻塞道路，“虽有云南，不能守也”。<sup>1</sup>故入滇大军在沿湖广至安顺通道入滇之际，即开始“沿途设堡”。<sup>2</sup>并谕令归顺的乌撒、乌蒙等各部土司：“宜率土人随其疆界远近开筑道路，各广十丈，准古法，以六十里为一驿。”<sup>3</sup>同时在洪武十五年（1382年）在贵州设置了省级最高军事单位的“贵州都指挥使司”，开始在各入滇驿道上陆续建立卫所。明永乐十一年（1413）以平定思州土司叛乱为契机，正式设立了贵州省（即“贵州布政使司”），将思州、思南土司辖地析为铜仁、黎平等八府，并领州县若干及数十个土司辖地。这时分布在“贵州布政使司”领内各驿道旁的卫所，已有十八卫，其后在省内前后共设置三十卫之多。

可以说，当初贵州省之设立，目的就是为了保障通往云南省驿道的安全。而其中又尤以保护由湖广辰州至贵州普定，东西横跨贵州省中部入滇的所谓的“东路”为主。如此一国政府为保护一条交通要道而专门设置一省级单位这样的重大举措，即使从世界范围内看，也可谓为罕见之举。对此明代的官方文献曾有明确表述：“贵州四面皆夷，中路一线，实滇南出入门户也。黔之设，专为滇设，无黔则无滇矣。”<sup>4</sup>明代著名地理学家王士性（1547-1598）在其《广志绎》一书中亦云：“西南万里滇中，滇自为一国，贵竹（贵州）线路，初本为滇之门户，后乃开设为省者，非得已也”。<sup>5</sup>在这里，他明确指出了贵州之建省，乃是为保障入滇“东路”之安全的“不得已”之举。而这实缘于贵州省在西南地区所处的重要地理位置之所然。对此清初顾祖禹在其《读史方輿纪要》中有过颇为生动的描述：“贵州之地，虽偏隅逼窄，然驿道所经，自平溪、清浪而西，回环达于西北，几千六百余里。贵阳犹人之有胸腹也。东西诸府卫，犹人之两臂然。守偏桥、铜鼓以当沅、靖之冲，则沅、靖未敢争也。据普安、乌撒以临滇、粤之郊，则滇、粤不能难也。抚平越、永宁以拒川蜀之师，则川蜀未敢争也。所谓以守则固矣。”<sup>6</sup>

乾坤几经嬗变，一线横贯东西。几百年来，当初国家政权用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开辟出来的这条“官道”，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科技的进步，由湖广入滇的驿道变成为湘黔滇公路，其后又建成了湘黔滇铁路。但无论怎样，这条连接三省的交通要道的战略地位及其重要性从未褪色和中断过。回顾明清时代以来的历史，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国家化”过程，汉移民大量移入及其文化的渗透影响，“苗疆”这一重要的地缘政治概念的形成及其“改土归流”等一系列重大社会变革，无一不与这条驿道有着密切的关系。并且，数百年历史的连续不间断的影响，尤其是明清时代各地汉族移民的大量移入和汉文化向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和渗透，除了在驿道沿线留下了大量历史文化积淀外，在汉文化这一坐标系上，各个非汉族群因受影响不同，也形成了具有显著的地方或族群特色的文化个性。而民族及族群间的互动关系也频繁而复杂，如现今中国的“待识别民族”中的90%以上都分布在这条驿道及其周边地域，由此也可看出，长期历史过程所造就的深厚文化积淀、多样性及族群/民族关系的复杂样态，已远非可以用局部视野或单一学科来覆盖了。<sup>7</sup>

<sup>1</sup> 《太祖洪武实录》卷141。引自《明实录 贵州资料辑》，贵州民族研究所编，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页。

<sup>2</sup> 《（民国）《贵州通志·前事志》卷2。贵州文史馆点校，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页。

<sup>3</sup> 《太祖洪武实录》卷142，引自《明实录 贵州资料辑》，贵州民族研究所编，第1页。

<sup>4</sup> 《（民国）《贵州通志·前事志》卷2，第521-522页。

<sup>5</sup> 《（明）王士性：《五岳游草 广志绎》，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33页。

<sup>6</sup> 《（清）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120《贵州方輿纪要序》，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4526页。

<sup>7</sup> 对于元明清时代在西南地区驿道交通及其作用等，目前已有不少学者进行过若干梳理及研究，然这些研究对贵



基于以上思考,笔者首次提起了“苗疆走廊”这一概念,旨在从地域及社会空间的整体视野出发,关注在以特定的交通线路为中心形成的,呈线性或带状相连的地域范围内,通过对分布在这一特定地域内的国家及民族、族群社会间相互关系的考察,从多学科角度探讨地域内的社会与自然生态间的关系,各族群/民族文化间的共生及相互影响过程等。以下笔者拟对这一概念之内涵加以若干探讨与界定,并就其所特点等内容进行一些初步的总结,以见教于同仁。

## 二、

就本文所提起的“苗疆走廊”而言,从地域空间上看,主要指的是上述的明代以后正式开辟的起于湖广常德,经辰州(沅陵)、沅州(芷江)等地,东西横贯贵州中线的所谓入滇“东路”或“一线路”,沿这条古驿道形成了一条穿越数省、长达千余公里,涉及数万平方公里面积的狭长地带。但明清前旧有的经贵州西北入滇“西路”驿道,明代徐霞客从广西经贵州都匀北上与“东路”驿道相连接的“南线”,以及从贵阳经遵义入川的“北线”,是否可视为广义上“苗疆走廊”的组成部分,尚留待进一步讨论。

在前近代时期,“苗”和“夷”一样,曾经是中国南方,尤其是以贵州为中心的西南非汉族群的泛称之一。从清代后期直到民国早期,对这一区域的非汉族群多以冠以“苗”之称谓。因其族群种类多种多样而有“百苗”之称,故此处所称的“苗”,不仅包括今天的苗族,也涵盖了所有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而“苗疆”作为一个重要的地缘政治概念,是在明清时代,尤其是清代以后才逐步形成的。自明季开始,“苗”逐渐取代过去的“蛮”成为汉民族对南方非汉族群的泛称。按上述王士性的《广志绎》所载:“其在黔中者,自沅陵至普安两千里,总称曰‘苗’”,由此可知,“苗”最初作为泛称出现的地域,可能就始于辰沅至普安段“一线路”之周边地区。<sup>1</sup>其后“苗”之指称范围逐渐扩大至整个中国南方的非汉族群,而“苗”之分布地域,也称之为“苗界”或“苗疆”。清代以后,“苗疆”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地缘概念,其范围涵盖了贵州全省及周边省份的邻接地带。由此可以说,“苗疆”这一地缘概念的形成,恰好是和上述湖广入滇的这条驿道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换言之,明代以后随着“一线路”驿道的贯通,国家权力和汉族移民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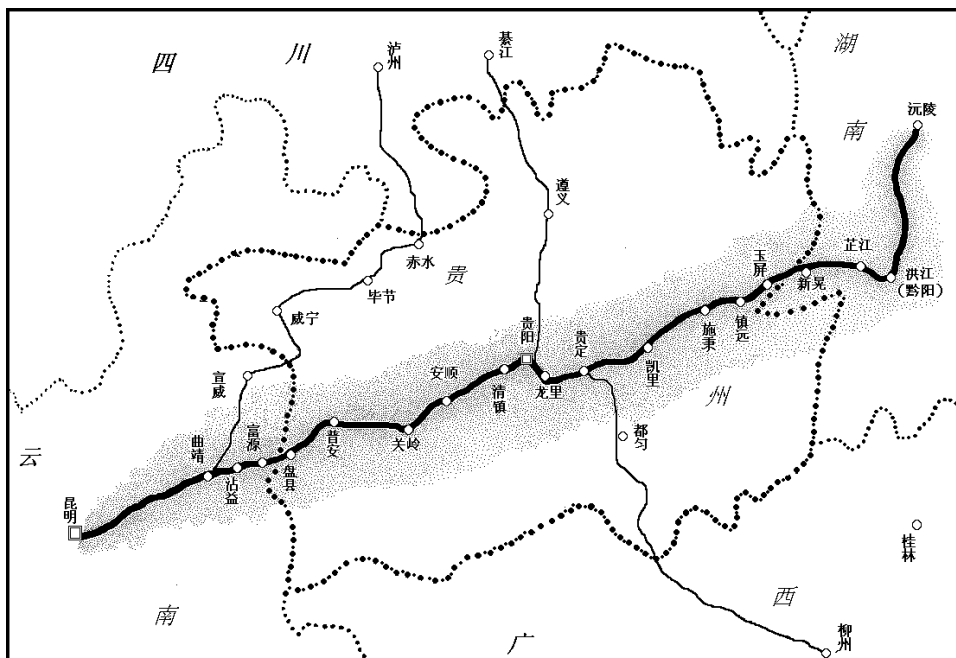
---

州段线路多一笔带过,且大多限于从交通史或历史地理变迁等角度展开,注重驿道上的物流形态、过程或对政治经济的带来的影响,从动态角度对驿道沿线地域内的文化及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积淀进行深入研究的结果尚不多见。相关论文见陈庆江:“明代云南东西交通线上政区治所城镇的城池”(《中外关系史论丛》,云南大学2001年版,432-440页)、“元代云南通四川、湖广驿路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6月,第18卷第2辑)、方铁:“唐宋元明清的治边方略与云南通道变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3期)、都杰:“宋至清代(1840年以前)滇黔桂交通研究”(云南大学人文学院硕士论文,2010年)、蓝勇:“清代滇铜京运对沿途的影响研究——兼论明清时期西南资源东运工程”(《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年第4期)等。对贵州省的建省背景、地理位置与驿道交通的关系,亦有学者关注而屡有论及,这些研究多从政治、经济等层面上探讨了驿道的开辟及其相关影响,但仍然缺乏从“驿道”为切入点的地域空间的整体视野,而关注随驿道开辟对周边地域社会的多重影响等相关研究成果亦涉及不多。近年来,有的学者开始关注到驿道对西南地区的“国家化”及城镇格局形成带来的重要影响。如孙兆霞提出了“通道”概念,认为正是因为驿道(“通道”)的打通,才使得国家力量和汉族移民渗入到贵州这一“蛮荒之地”,导致了新的民族关系的建构和城乡一体分布格局等的出现。汤芸等则从贵州省城镇体系发展过程,关注到驿道沿线分布的卫所与城镇分布格局之间的关系,指出贵州城镇体系格局的形成,实因于明代分布在驿道沿线的卫所。然这些研究多聚焦于驿道与某些局部问题或领域之间关系的探讨,尚有诸多值得进一步探索的空间。相关论文参考见史继忠:“贵州置省的历史意义”(《贵州民族研究》1997年第3期)、“驿道提升贵州战略地位”(《当代贵州》2011年4月上,第10期)、“试论贵州省的形成”(《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移民大潮推动贵州开发”(《当代贵州》2011年4月下,第12期)、范同寿:“清末贵州交通的发展”(《贵州文史丛刊》1997年第7期)、王继红 罗康智:“论明代贵州卫所建置的特点及其职能”(《贵州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年第6期)、钟铁军:“释明代贵州之‘州卫同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3月,第19卷第1辑)、孙兆霞 金燕:“‘通道’与贵州明清时期民族关系的建构与反思”(《思想战线》2010年第3期)、汤芸 张原等:“从明代贵州的卫所城镇看贵州城市体系的形成机理”(《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年第10期)等。

<sup>1</sup> (明)王士性:《五岳游草 广志绎》,第334页。

得以深入到这一“蛮荒之地”，并和当地非汉族群关系发生了近距离的交往。在对各个“苗种”社会有了更具具体认识的同时，“苗疆”这一概念也逐步形成并呈现出扩展之趋势。故笔者对上述驿道冠之以“苗疆走廊”之名，实因上述两者间的内在因果关联而来。<sup>1</sup>

“苗疆走廊”示意图



本图为杨志强教授根据《中国历史地图集》绘制。图中粗线附阴影的条状地带为“苗疆走廊”交通线及周边文化遗存丰富、民族/族群关系频繁交叉影响的地带。

自 20 世纪 80 年代由已故的著名学者费孝通先生提出“民族走廊”概念以来，将族群/民族的流动迁徙、互动认同以及文化特征等问题置于某一地理空间视野下进行考察，即“地域+民族”的研究范式，一直成为民族学等相关人文社会科学关注的热点领域之一。所谓的“走廊”，在地理学上原指的是连接两个区域中间的狭长地带。而“民族走廊”则多指的是民族或族群长期沿着一定的自然环境如河流或山脉向外迁徙或流动的过程中，在相关线路上保留下来的历史文化积淀。<sup>2</sup>在这些研究中，如“藏彝走廊”、“河西走廊”、“武陵走廊”等地域概念，其对“走廊”之界定所强调的侧面虽各有不同，但一般都认同“走廊”式的山川地理地貌特征对族群迁徙流动及其族群关系和文化等带来的影响。与此相对，“苗疆走廊”在明代以后常称为“一线路”，而这里

<sup>1</sup> 现学界一般把“苗疆”区分为狭义的“苗疆”和广义的“苗疆”这两个不同的层面。前者专指明至清代早期尚属于“化外之地”的现黔东和湘西相交的腊尔山一带的“生苗地界”，即所谓的“湖南苗疆”。这是“苗疆”之称谓最早出现的地域。另外一片“苗疆”地域则为贵州省清水江与都柳江之间，现贵州黔东南自治州境内的台江、榕江等县，即所谓的“千里苗疆”。清初这里尚属于既无流官控制，又无土司管辖的“生苗地界”。清雍正年间“开辟苗疆”以后，在此设立了“新疆六厅”，文献中亦称为“贵州苗疆”。狭义上的“苗疆”所指多偏重从政治及文化层面上的“王化”与“教化”的关系展开。广义上的“苗疆”则较为模糊，多作为一个地缘政治概念使用，既指贵州全省，有时也包括相关的邻接地区。如《清世宗实录》卷 147，雍正十二年条中就有“云、贵、川、广等苗疆地方”。（民国）《贵州通志·前事志》卷 3 亦辑录了一些相关材料（见第 156、158、176、184、185 等页）。另凌锡安：《咸同贵州军事史》一书中引同治年间曾任贵州巡抚的曾璧光奏折云：“查黔省十二府，四直隶厅州，均属苗疆”。此外，“苗疆”最早出现时期及所涵盖的具体范围尚无专文梳理，贵州大学林芊先生认为明代仅有“苗界”而无“苗疆”之说，“苗疆”主要是出现在清代以后。但无论怎样，贵州省始终构成为“苗疆”的腹地，大致是可以肯定的。

<sup>2</sup> 李绍明：《李绍明民族学文选》，成都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0 页。



所谓的“一线”并非是依地理走势“自然”形成的。可以说，它最初就是在国家军事政治力量等的强力介入下，以交通线为中心，将平原、丘陵、山地、高原台地等不同地貌相勾连，在文化上形成既有族群多样性，又具有地域共性，并在沿线保留了大量的历史积淀的、呈带状相连的区域。因此，这种类型的“走廊”更多地受到政治、经济等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而山川形势等自然地理因素在其中的作用则位居次要。

因此，也可以说，“苗疆走廊”一开始就是在强烈的国家意志下被开辟出来的一条“官道”。这也彰显出和以往“茶马古道”、“南方丝绸之路”这样的自然形成的“商道”或如“民族走廊”这样的依地理山川走势形成的交流线路的不同之处。当然，交通驿道体系的建设为历代王朝权力维系其统治必不可少之一环节，因此驿道在广义上都可称为“官道”。然而，像“苗疆走廊”这样，既是连接“边缘”与“中心”的一条重要通道，但同时对其所经的周边地域及族群社会的政治、经济及文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其历史文化遗存不仅厚重而多样，并且各文化间的交融及影响持续数百年仍保持着其鲜活之形态延续至今。此种情形则实不多见。在此，笔者就“苗疆走廊”之特点仅提出一些初步的看法，以抛砖引玉，期待后贤。

首先，“苗疆走廊”的开辟及其随之而来的贵州建省，对推进整个西南地区的“国家化”或“内地化”进程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sup>1</sup>明初征服云南后，进而在驿道沿线设置卫所，以图固守。贵州建省之前，明王朝就先于明洪武十五年（1382）建立了省级军事单位的“贵州都指挥使司”，沿驿道设置了十八卫、二所。贵州建省后，据研究，前后设置在贵州省内的卫所共有三十卫、一百四十余所，其规模远远超过为这条驿道所连接的云南与湖广两省。<sup>2</sup>按明初洪武六年（1373）全国的卫所兵力约有一百七十万人计算，驻扎这里的卫所军队数量约占了当时的近十分之一左右。<sup>3</sup>这些卫所除铜鼓卫（现锦屏县）、五开卫（现黎平县）外，都分布在驿道沿线，而其中除“西四卫”驻守在入滇旧路的“西路”，和“都匀卫”驻守在广西进入贵州驿道上外，其余都集中在辰沅经普安入滇的“一线路”上。由此也可看出明王朝对这条驿道重视之程度。从明代直到清代前期（雍正年间），朝廷对“苗疆”内的土司及少数民族的多次用兵，其背景其实都与因其“阻塞官道”有关。而中原王朝实施的一系列政治、军事举措，如明代“苗疆边墙”的修筑、清初大规模的“改土归流”以及“开辟苗疆”等等，也无不与维护这条“官道”的安全通畅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总的看来，整个明代，王朝权力在贵州的统治基本上采取的是“守势”策略，即以维护交通驿道的安全为中心而无暇顾及及其他。“夷多汉少”的状况并未改观；到了清代以后，国家权力便依托“苗疆走廊”不断向周边地域渗透，将这些地区置于其直接统治下，大量汉族移民也随之涌入“苗疆”及西南边陲，由此“内地化”进程急剧展开。因此可以说，“苗疆走廊”不仅是维系中原与西南边陲的重要通道，并且它对整个西南边疆地区政治格局的变化和“国家化”过程都带来了多方面的重要的影响。只是目前从这一角度切入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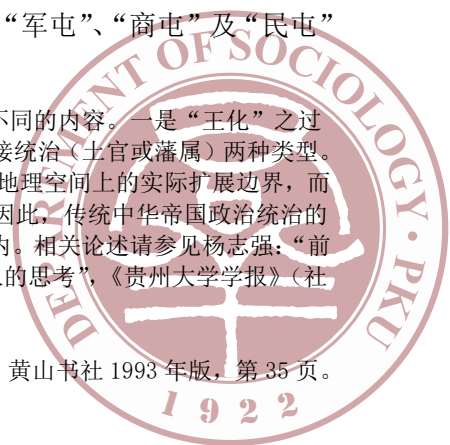
其次，自国家权力用政治军事力量强力打通“苗疆走廊”后，从某种意义上看，它不仅是连接中原与西南边陲的一条重要通道，同时也形成了一条穿越了众多“异文化”，即非汉族群分布地域的狭长的“汉文化走廊”地带，并不断影响和辐射周边地区。

贵州在建省前，一直是众多非汉族群密集分布的地域。明代通过“军屯”、“商屯”及“民屯”

<sup>1</sup> 这里所谓的“国家化”，在前近代时期“华夷之辨”结构下，实际上具有两层不同的内容。一是“王化”之过程，体现为是否接受王朝权力的政治统治，大致可分为直接统治（流官）和间接统治（土官或藩属）两种类型。其政治边界构成了中华帝国的“疆域”范围。二是“教化”过程，即汉文化在地理空间上的实际扩展边界，而这往往与汉移民的流动迁移有关，由此形成了两条并非完全重叠的“边界”。因此，传统中华帝国政治统治的疆域内实际上是内包着政治“一体”及文化“多元”这一多重“华夷次序”在内。相关论述请参见杨志强：“前近代时期的族群边界与认同——对清朝中后期‘苗疆’社会中‘非苗化’现象的思考”，《贵州大学学报》（社科版）2011年第5期。

<sup>2</sup> 陈国安、史继忠：“试论明代贵州卫所”，《贵州文史丛刊》1981年第6期。

<sup>3</sup> 方志远：“明朝军队的编制与领导体制”，《明史研究第三辑》中国明史学会编，黄山书社1993年版，第35页。



等移入了近百万汉族移民，并在卫所的基础上开始筑城，出现了贵州省的第一批城镇集群。<sup>1</sup>但明代终其一朝，汉人主要沿仍是驿道线分布。“其地止借一线之路入滇，两岸皆苗”。<sup>2</sup>而驿道上移动的也主要是过往行客，“黔之往来居十之四，滇之往来居十之五，楚、蜀之往来居十之一”。<sup>3</sup>至明代后期，卫所荒废，军户流失和逃亡现象严重。明崇祯十一年（1638），徐霞客在游至贵州安顺、关岭一带时，对此曾感叹：“各州之地，俱半错卫屯，半沦苗孽，似非当时金瓯无缺矣。三卫之西（指普定卫、安庄卫、安南卫），为水西所苦。其东又诸苗杂据，唯中一通道行耳”。<sup>4</sup>也就是说，到了明代晚期，国家权力仅能勉强维持这条驿道的通行。到了清代，在康熙年间经历了“三藩之乱”后，贵州全省各地的在籍人口就仅余万余人。其后随着王朝权力统治的安定化，从康熙至雍正年间，对土司地区开始实施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政策，对一些不服王化亦无土司统辖的“生苗地界”，则直接采取军事征服的手段“开辟苗疆”；在各非汉族群分布地区推行府州县制的同时，又开辟疏通了一批新的水陆交通线，形成了以“一线路”为中心的水陆交通网。乾隆时期，受内地汉族人口剧增的压力影响，大量汉民开始自发流入“苗疆”各地。而横贯贵州省中线的这条“苗疆走廊”也成为湖广等内地汉民进入西南的主要通道。随着汉民的大量移入，至乾隆晚期，贵州省的在籍人口已从清初的万余人猛烈增长到五百余万人。<sup>5</sup>这其中，除了自然增长和在非汉族群地区普遍推行户籍制度外，主要是由于外来移民人口造成的。因此可以说，“苗疆走廊”不仅是一条物流通道，更是汉人移入西南的“人流”大动脉。并且以这条“走廊”为中线呈现出“一线分南北”之势，即王朝权力的政治与文化的“华夷”界线在地域上也呈现出明显的南北分布特征。如明代后期，以这条走廊为界线，以北大多（不含黔西北部）为接受“王化”的“熟苗”，以南则多为“生苗”地界。至清代中期后，随着汉民的移入，走廊一线以北逐渐成为汉区，在乾隆初期即形成了“生苗在南，汉人在北，而熟苗居中间”之分布格局；<sup>6</sup>清朝道光年间，随着汉人的剧增，以往的“生苗”、“熟苗”称谓逐渐消失，官府对其治下的臣民大多区分为“民”·“苗”这两个不同范畴。而这大体上也是以“苗疆走廊”为界构成南北两大区域，以北多为汉区（除黔西北和黔东北部分地域外），以南则多为“苗”之分布地域。这种民族/族群在地域空间上呈现出的“南”·“北”分布格局一直延续至今。现今贵州省的三个民族自治州，即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和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均分布在过去的“一线路”以南地区。由此愈加凸现出“苗疆走廊”在地域及民族文化研究上的重要性。

第三，因此可以说，“苗疆走廊”也是一条以“移民文化”为其特色的文化走廊，它跨越了众多非汉族群分布的地域，并且至今仍然是汉族与非汉族群在文化上频繁交汇和相互影响的交界地带。数百年文化间交汇的历史，在这条走廊沿线不仅留下了深厚的积淀，也造就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事像。贵州省全域来看，城镇大多是在原卫所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城镇分布的密度以及汉文化积淀最为集中的地域事实上也正是沿“苗疆走廊”呈带状分布。如镇远青龙洞古建筑群、黄平飞云崖、贵阳青岩古镇、安顺孔庙以及各地遗留的各省移民会馆等。在地域文化上还有诸多流传在各地民族民间社会中的傩面具、地戏、军戏以及花灯戏等。其中安顺明代移民后裔“屯堡人”中流传的地戏，其中心在安顺，并一直延伸到云南澄江县，基本上也是沿这条走廊带传播分布，呈现出明显的带状分布状况。此外，各地非汉族群社会在主流社会和文化的影

<sup>1</sup> 钟铁军：《释明代贵州之“州卫同城”》，《中国历史地理》2004年3月，第19卷第1辑；王东民：《贵州的古城》，《贵州文史丛刊》1989年第8期；汤芸、张原等：《从明代贵州的卫所城镇看贵州城市体系的形成机理》，《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年第10期等。

<sup>2</sup> （明）王士性：《五岳游草 广志绎》，第325页。

<sup>3</sup> （明）李化龙：《黔省善后事宜疏》，（民国）《贵州通志 前事志》卷2，第522页。

<sup>4</sup> （明）徐弘祖：《徐霞客游记》，重庆出版社2007年版，第278-279页。

<sup>5</sup> （清）嵇璜等：《清朝文献通考·卷十九·户口》，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sup>6</sup> （清）《杨名时奏陈绥定苗疆之策折》乾隆元年五月初二日，《清代前期苗民起义档案史料》（上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室、贵州省档案馆合编，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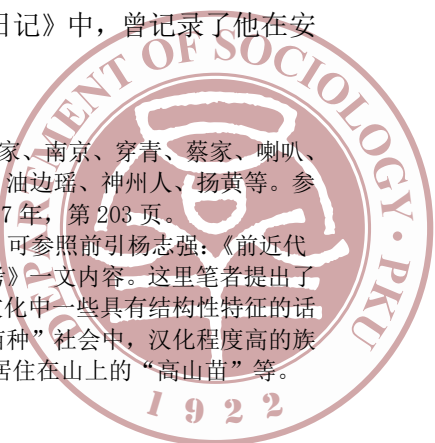
化的熏染，同时又因地域或族群的不同而形成具有自身特点的多样性特征。如黔东的侗族社会，其“侗戏”形成与发展，就受到了汉文化的强烈影响，并且侗语基本上也是以这条走廊为界分成南侗与北侗两个方言区。而在汉族社会中几乎无人不晓的“苗疆”之“蛊毒”言说，事实上最早文献记录也是出现这条走廊地带的与汉人社会往来密切的一些非汉族群社会中，如“仲家苗”（布依族）等。在这一地域一些汉族社会、包括部分少数民族社会中至今流传的“调南征北”、“安屯设堡”，以及祖籍来自“江西”说等传说，显然也是受到后来汉移民文化的影响。此外，沿着“苗疆走廊”，汉文化对走廊的周边非汉族群社会的影响，距离愈远，空间上也呈现出递减趋势。现今贵州省所谓的“原生态”文化最集中分布的地区，大多就位于像月亮山、雷公山等这样的远离走廊或地理阻隔的偏僻之处。

第四，“苗疆走廊”上频繁的人口及文化的流动，也形成了极其复杂的民族/族群关系。历史上，在这条走廊上移动的不仅有汉族移民，也有不少非汉族群的群体沿这条通道迁徙移动，造就了复杂多样的族群认同的“边界”。80年代初期，在国家重新进行“民族识别”的过程中，云南省及贵州省内要求重新进行民族身份识别大多数群体都分布在这条走廊线上。以贵州省为例，要求重新进行“民族识别”的群体最初共有八十多个，后被归并为二十三个，约有九十余万人。<sup>1</sup>这其中，除“长袍瑶”、“六甲”等少数外，大多数都分布在“苗疆走廊”的沿线条状地带内。如贵州西部地区的七姓民、卢人、羿子、南京、穿青、蔡家、喇叭、里民，以及东部地区的木佬、革家、东家、西家、绕家等。其后经过识别和归并，贵州省的“世居”少数民族增加到十七个，但仍有“穿青”、“革家”等“待识别民族”近八十万入全分布在这条走廊沿线，约占今天全国“待识别民族”人口总数90%以上。从上述这种情况也可看到，正是由于“苗疆走廊”历史上频繁的人口移动，以及族群间复杂的互动关系造就了族群间这种复杂认同边界的形成。回顾过去，一方面，自明代以后，随着“内地化”进程的展开和汉民的移入，一些非汉族群社会除了依其语言、服饰种类或婚姻圈等文化要素来划分其“传统的”认同边界外，同时依汉化程度的高低，将“华夷之辨”这一“文明—野蛮”的二元结构图式进行自我内化和再现，建构起了新的族群认同边界。<sup>2</sup>另一方面，即使在汉人社会中，明代军屯、民屯后裔“屯堡人”、“穿青人”之间，以及他们与后来移入的“客民”之间的隔阂，都对其后的“民族识别”工作带来很大的影响。因此可以说，“苗疆走廊”沿线地带不仅在文化上兼具地域“共性”及族群“多样性”特点，并且历史上剧烈社会变动背景及族群间的复杂关系导致了汉族内部、汉族与少数民族以及少数民族内部之间形成的多重认同边界，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这在当今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都是独具特征的。因此从经济、政治、文化等诸领域考察历史上“苗疆走廊”这一地域范围的民族/族群社会文化变迁过程，不仅对加深理解中国独特历史背景下的“民族”或“族群”问题具有现实意义，并且在族群理论问题一直是国际学术研究所关注的热点和前沿的今天，对建构起具有中国自身特色的族群理论观点，消解西方话语霸权的垄断和“问题殖民主义”的影响，也不啻为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展开学术实践活动的资源宝库。

第五，除此之外，在中华帝国与周边国家的“朝贡体系”下，“苗疆走廊”还是一条连接中国与东南亚之间关系的重要国际通道。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在《黔游日记》中，曾记录了他在安

<sup>1</sup> 这二十三个要求进行“民族识别”群体分别是：六甲、七姓民、卢人、羿子、龙家、南京、穿青、蔡家、喇叭、里民、木佬、革家、东家、西家、绕家、三撬、下路司、刁族、长袍瑶、莫家、油边瑶、神州人、扬黄等。参照《贵州民族识别资料集》第一集，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识别办公室编，1987年，第203页。

<sup>2</sup> 有关“苗疆”内一些非汉族群在清中后期出现的“非苗化”现象及其具体内容，可参照前引杨志强：《前近代时期的族群边界与认同——对清朝中后期“苗疆”社会中“非苗化”现象的思考》一文内容。这里笔者提出了“结构再现”之观点。认为一些非汉族群在汉化过程中，也会依照主流社会文化中一些具有结构性特征的话语体系（如“华夷之辨”等）进行自我再现和新的族群边界的构建。即同在“苗种”社会中，汉化程度高的族群往往歧视那些比他们“野蛮”的族群，或居住在平地水边的“平地苗”歧视居住在山上的“高山苗”等。





顺附近查城驿道上见到大象和伺候的“象奴”路过的情景。<sup>1</sup>另据笔者了解，在黔东南凯里（明代的清平）附近的苗寨中，今天依然还存有当时供缅甸等国朝贡的大象休息的“象亭”遗址。而在有“黔东门户”之称的镇远，在县城东横跨舞水的祝圣桥魁星阁上，现今还挂着书有“劈开重译路，缅人骑象过桥来”之对联。<sup>2</sup>只是囿于笔者知识水平所限，加上目前甚少看到相关的研究著述，故在此仅提起这一问题意识，尚有待今后学人的进一步挖掘研究。笔者相信，今后对于“苗疆走廊”作为国际通道的定位这一问题展开相关资料的搜集和研究，倘有所获，对现今推进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将起到非常正面的作用。

### 三、

展开“苗疆走廊”研究，不仅学术上将西南地域与民族文化研究提供新的视域，并且对推动以西南地区的经济建设及文化产业发展也将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首先，通过“苗疆走廊”概念的提起与学术研究，推动其作为世界新文化遗产类型——“文化线路”的重构、保护、开发与申报，对促进整个西南地区的文化建设及经济发展，都将起到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际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上开始将“文化线路”（Cultural Route）理念引入到文化遗产类型中，强调其作为“动态”的无形文化遗产价值，以区别于以往的“文化景观”、“自然与文化遗产”等有形遗产。<sup>3</sup>2008年10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在第16届大会上通过的《2008文化线路宪章》中，对“文化线路”概念内涵进行了明确的定义，强调其“作为整体的跨文化意义”以及“动态特性”等具体特征。并在文本中指出：“通过把文化线路理解为不同民族不同人群间同一系列文化交流的动态要素，我们才能将其遗产资源置于真实的空间和历史范畴中去理解。”、“文化线路把多样性的地理和遗产资源连接起来，形成独特的整体。文化线路及其环境与不同的自然和文化景观相关联，构成文化线路的各部分，并由于经过地区和区域的不同而展示出各自独特的风格和特征。这些不同地段丰富多样的景观也塑造了文化线路整体的多样性特征。”<sup>4</sup>从“文化线路”有关的定义中可看到，它注重的是在某一地域空间下文化的流动性及其相互影响，各个看似孤立的景观、遗址等有形物质遗产被置于相关的无形文化背景中而连为一体，“其动态性和历史文脉已经生成或仍在继续生成相关的文化要素”。<sup>5</sup>在这一理念下，即使已消失或遭破坏的一些文物景观或遗存，只要其背后的无形文化的脉络继续存在或得到认可，也可进行人工复原而无妨其作为“遗产”存在之价值。上述“文化线路”概念的提起及其相关理论的诠释，一方面，反映出当今世界对特定地域空间内的不同民族/族群间文化交流互动现象的高度重视，同时也与人类学的结构主义等理论乃至现今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中对人类思维及文化事像

<sup>1</sup>（明）徐弘祖：《徐霞客游记》，重庆出版社2007年版，第285页。

<sup>2</sup>镇远祝圣桥建于明代，桥上的魁星阁则为清代所建。百余年前日人鸟居龙藏经过镇远祝圣桥时，抄录了魁星阁上的这段对联。其上为“阿山柱石”，左为：“扫净五溪烟，汉使浮槎榨斗出”，右为“劈开重译路，缅人骑象过桥来”，现经修复过的对联将横批改为“河山石柱”，将“榨斗”改为“撑斗”，似有误。

<sup>3</sup>李伟、俞孔坚，“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新动向——文化线路”，《城市问题》2005年第4期、刘修兵：“文化线路成我国遗产保护‘新宠’”，《西部时报》2009年4月17日第9版等。

<sup>4</sup>《2008文化线路宪章》对“文化线路”定义的正文为：“无论是陆地上，海上或其他形式的交流线路，只要是有明确界限，有自己独特的动态历史功能，服务的目标特殊、确定，并且满足以下条件的线路可称为文化线路：1，必须来自并反映人类的互动，和跨越较长历史时期的民族、国家、地区或大陆间的多维、持续、互惠的货物、思想、知识和价值观的交流；2，必须在时空上促进涉及的所有文化间的交流互惠，并反映在其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3，必须将相关联的历史关系与文化遗产有机融入一个动态系统中。”参见2008年10月4日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十六届大会通过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文化线路宪章》，引自丁援：《文化线路：有形无形之间》，东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7页-93页。

<sup>5</sup>姚雅欣 李小青：“‘文化线路’的多维度内涵”，《文物世界》2009年第1期。



背后的各种“关系”的思考深度契合在一起；而“文化线路”作为一种新遗产类型被列入国际遗产保护领域的框架中，对中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及文明古国也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近年来，“文化线路”问题已引起了国内从事文化遗产研究和保护的学者们的高度关注。学者们在从多维度对这一问题进行理论探讨的同时，把“茶马古道”、“京杭大运河”、“蜀道”等作为“世界文化线路”遗产的论证和申报工作也正在积极推进之中。<sup>1</sup>

就本文所提起的“苗疆走廊”而言，历史上这条穿过湘、黔、滇三省的古驿道不仅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曾对西南边疆地区产生过重大的影响，还在沿线地区遗留下大量的有形和无形文化遗产。除汉族外，“苗疆走廊”穿越的沿线地域内至今还有20多个民族/族群分布其间，民族间的文化现今仍处在频繁互动交流中。此外，如果以湖南省常德市为起点，云南省昆明市为终点，按今天的行政区划为单位统计的话，这条走廊大约穿过了31个县市，涉及到7万多平方公里的地域，2400余万人口。因此，“苗疆走廊”这一概念的提起，也可为包括贵州省在内的西南地区今后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一条新的思路。

以贵州省为例，自2002年《贵州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制定颁布以来，以旅游观光作为经济发展的战略支柱产业已成为共识。2010年，贵州省的旅游总收入已突破千亿元大关。<sup>2</sup>但此前在对贵州省的旅游资源的讨论和定位中，除“喀斯特地貌”等自然景观外，对“文化”资源的认识，多集中在“民族风情”、“红色文化”、“夜郎文化”等层面，现今则更多的侧重于对“原生态”民族文化的宣传与开发。<sup>3</sup>长期以来，由于我们一直缺乏对贵州文化“主体性”地位问题的深度思考与认知，在谈及“移民文化”之际，仅将“屯堡文化”、“雉文化”、“安顺地戏”等进行点状罗列，有的甚至将其视为“外来文化”。<sup>4</sup>事实上，如果把少数民族的“原生态”文化比作一件色彩斑斓的“外衣”的话，那么，可以说历史上由国家权力的强力介入以及“苗疆走廊”上的“移民文化”所造就的政治、经济格局以及文化的地域性及族群多样性才真正构成了贵州的“脊梁”。

此外，通过仔细阅读和参照上述《2008 文化线路宪章》有关“文化线路”的相关定义及各项指标，可以看到，其与“苗疆走廊”沿线的文化景观、民族/族群间的文化互动等有着颇多重合之处。其实，现今对过去“苗疆”境内的古交通驿道，有学者已敏锐捕捉到其作为“文化线路”遗产的潜在价值，如娄清在《保护贵州的文化景观和文化线路》一文中，就指出应将“文化线路”之概念运用于对清水江等河道以及古驿道、古盐道等文化沉积丰富地带的保护工作，通过深入普查、整理和研究，整体拓展贵州文物保护的思路。<sup>5</sup>就本文提起的“苗疆走廊”今后在文化产业开发中潜藏的巨大价值，以及作为世界“文化线路”遗产申报的可能性等问题，笔者在此仅提供一些初步看法，尚有待于今后专家和学者进一步探讨。

其次，从学术层面看，自清末中国开始近代“民族国家”体制的建构以来，“民族”一语始终与“国家”一道，成为不同场合下各种表述的核心话语之一。其中素有研究“异文化”传统的西方人类学从进入中国伊始，就被赋予建设“民族国家”之使命而具有强烈的“领土向度”——地理空间上的领土“界线”也成了中国人类学研究的边界及外延。在这一背景下，从来的人类学“殖民地”研究传统被置换为“边疆研究”或“边政研究”；而“异文化”则被转换成“少数民族文化”，同为“中国国民”的非汉族群在这过程中不自觉地被异化成了文化上的“他者”。另一方面，对“民族”话语的强调，使得我们一旦进入民族地区，就惯于偏重从“族群”或“民族”

<sup>1</sup> 《云南茶马古道将申报“世界文化线路遗产”》，《福建工商时报》2009年8月7日，单霁翔：《积极推动蜀道文化线路保护与申遗工作》，《中国文物报》2011年9月16日等。

<sup>2</sup> 《贵州旅游总收入首破千亿元 比2009年增长30% 全年接待人数达1亿》，大众网（[www.dzwww.com/http://www.blog.sina.com.cn/s/blog\\_485dcc670102dtt6.html?ti=1](http://www.dzwww.com/http://www.blog.sina.com.cn/s/blog_485dcc670102dtt6.html?ti=1)）。2012年1月10引用

<sup>3</sup> 《稳步推进贵州旅游 倾力打造旅游大省——贵州省副省长包克辛访谈录》，《当代贵州》2004年第8期。

<sup>4</sup> 王鸿儒：《贵州传统文化与现代性转换》，《贵州社会科学》2003年第9期。

<sup>5</sup> 娄清：《保护贵州的文化景观和文化线路》，《中国文化报》2008年2月17日。



视野去审视诸相关问题而忽视了“地域”基础上的文化相似性或整体性问题。<sup>1</sup>这样一来，一些具有地域“共性”的文化特点或器物往往被人为地分割为“民族的”文化符号，从而使地域性的文化特点被漠视甚至被消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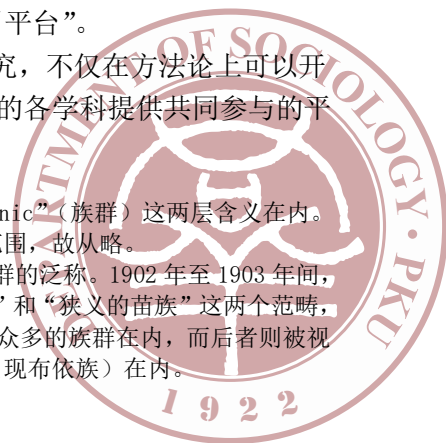
西南地区素以民族构成复杂和文化多样而著称。全国的56个民族中，除汉族外，有30多个少数民族分布在西南地区。许多民族不仅内部支系众多（如苗族、彝族等），并且分布上也呈现出跨地区、甚至跨国界的分散状况。在这里，所谓的文化的“多样性”，并非只是以“民族”为单位而更多是表现在民族内部各支系、亚群体，甚至是不同服饰种类或婚姻圈中。同样的，受强势汉文化的影响程度的不同，也会导致各少数民族社会在沿着汉文化坐标轴“进化”过程中形成差异，从而出现有别于“原生态”的另一层面的文化多样性特点。各民族“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分布上虽有自己相对集中的区域，但从广阔地域空间视野上看，大多又是处在交错杂居的状态；各民族相同或相似的自然环境中，长期互相交往，相互影响，在文化上也形成了诸多相似的共同特征。这种跨“民族”或“族群”的、具有地域特点在西南民族地区可谓“俯拾即是”。如婚姻习俗中的“行歌坐月”、“父子连名制”、“姑舅表婚”等；制度习俗中的“合款”以及物质文化中银饰、铜鼓、芦笙、刺绣、蜡染、杆栏式建筑等等。其实，对于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社会中一些具有普遍共性的物质或精神的文化要素，在近代人类学者最初涉足这一区域之际，就有所认识。上述的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在1906年出版的《苗族调查报告》一书中，就把“纹样”、“芦笙”、“铜鼓”视为南方非汉族群具有的共同特征。<sup>2</sup>然而，现今各民族的学者在对自己的文化进行概括与表述时，往往依“民族”为单位将这些地域性的文化现象或文化器物进行主观分割和重组。这过程中，我们看到，“合款”制度及习惯法被苗族、布依族、侗族学者分别表述为自身特有的社会组织形式；“铜鼓”成了壮侗语族文化标志；“芦笙”和“银饰”变成了苗族的代表性器物，蜡染则归之于布依族的特色。事实上，上述这些作为“民族文化”或“民族精神”象征标识，如芦笙在苗族中既非普遍存在，而且在相邻的侗族、水族、彝族中均可见到，而铜鼓在黔东南苗族的一些村寨中至今仍视为重宝。换言之，在过于强调以“民族”为单位的表述体系下，基于空间维度下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实被转述成彼此泾渭分明之想象，民族间的“边界”不断被固化，差异亦因之被扩大化。

通过“苗疆走廊”概念的提起，将“民族”或“族群”置于一个整体的地域空间下加以考察，在关注不同民族或族群的文化多样性问题的同时，对同一地域空间下不同民族或族群间的互动及依存关系，以及在此关系上形成的“地域文化”现象也要给予充分的注意。“苗疆走廊”历史上曾是连接“内地”与“边疆”的一条重要纽带，在沿线的周边地域中，各种社会·文化·族群等的关系显得尤为错综复杂。直到今天，在已有六百余年历史的“苗疆走廊”这条呈条状形的地域内，国家权力推行的“内地化”政策和汉文化的强烈辐射并没有泯灭掉周边的少数民族社会的文化，反而在“汉文化”的普遍影响之底色上，折射出多姿多彩的文化多样性特点，并以其鲜活之形态保存至今。因此，把“苗疆走廊”置于一个广阔的研究视域下展开，不仅限于人类学，并且也可为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如语言学、历史学、社会学、宗教学、民俗学、哲学乃至自然科学的农学、生态学等学科的参与，提供一个具有广泛可能性的共同研究“平台”。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苗疆走廊”这一概念的提起及其相关研究，不仅在方法论上可以开启西南地区地域与民族研究的新视域，为人文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各学科提供共同参与的平

<sup>1</sup> 本文在此讨论的“民族”一语，从内涵上应包括了“Nation”（民族）和“Ethnic”（族群）这两层含义在内。近年，对如何界定这两个概念一直有着不同的观点和争论，因不属本文讨论范围，故从略。

<sup>2</sup>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鸟居氏所谓的“苗族”在很长一段时期曾是南方非汉系族群的泛称。1902年至1903年间，鸟居龙藏在经过了实地调查后，第一次提出应把“苗族”区分为“广义的苗族”和“狭义的苗族”这两个范畴，前者作为与“汉族”、“印度民族”并列的亚洲三大“基础人种”之一，涵盖了众多的族群在内，而后者则被视为“纯苗”，仅包括“青苗”、“红苗”、“黑苗”、“白苗”、“花苗”和“仲家”（现布依族）在内。





台，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探索具有自身特色的理论构架和话语体系；并且以“文化线路”为切入点，关注“苗疆走廊”沿线及周边地区的古驿道、古建筑等“文化景观”的保护及修复工作；挖掘和整理各地相关的历史记录、口头传承、族群文化、风俗及仪式活动等无形文化遗产。如此不仅可为政府的旅游开发战略拓展思路，并且最终还可推动“苗疆走廊”作为“世界文化线路”遗产的申报，让历经六百年历史洗礼的文化走廊华丽转身，重现光芒。

## 【论 文】

### “苗疆”：“国家化”进程中的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社会<sup>1</sup>

杨志强<sup>2</sup>

#### 一、中央王朝与西南边疆

提起“苗疆”，许多人并不陌生。无论是清代小说《说岳全传》、金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还是现今网络上人气爆棚的动漫《不良人》、小说《苗疆蛊事》，甚至网络游戏《轩辕剑》、《天龙八部》等，都有对来自“苗疆”的人物描述或场景设置。在这些作品中，来自“苗疆”者的一颦一笑、举手投足间仿佛都散发着神秘和异样。对“苗疆”的这种“异质化”想象，早已渗入到主流话语对“苗疆”的营造中，因此它也成为中华大地上的一块充满神秘感和蛊毒想象的神奇之地。

明清时期，“苗疆”是构成中国疆域版图的重要组成部分，几乎涵盖了整个云贵高原地区。这里所说的“苗”是个泛称，“疆”则具有王朝国家治下的民族地区的含义，相当于今天所说的“民族地区”，现今的苗族聚居地区只是这一广阔地域的一小部分。当前的学者一般把历史上的“苗疆”分为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广义的“苗疆”以云贵高原为中心，包括周边少数民族分布的西南山区；狭义的“苗疆”主要指现今苗族聚居地区，一是在今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境内，称为“贵州苗疆”；二是黔东北与湘西交界地，即现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和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一带，是为“湖南苗疆”。这种划分恰恰反映出“苗疆”动态变迁的历史过程。在近代中国国民国家体制建立之后，“苗疆”作为地域概念不再使用，其广义所指已为当前文化地理意义上的“西南”概念所取代。这一区域，自古以来就是少数民族栖息分布之地，现今除汉族外，仍有苗、侗、布依、彝、水、土家、瑶等近 20 个世居民族，是中国民族种类最多、文化最多样的区域。

“苗疆”字样初现于明代，但作为一个有特定范围的地域概念形成于清雍正年间以后。明王朝建立后，国家首次以组织化移民的方式，从内地调遣大量汉人以“军屯”“民屯”“商屯”等形式移入西南民族地区，由此深刻地改变了西南民族地区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在这一过程中，“苗”开始取代过去的“蛮”，成为中国南方非汉族群的泛称之一；而“苗”与“苗疆”的出现与元、明、清时期中国的王朝国家政权在西南地区推行“国家化”政策，即自上而下进行政治、经济和文化整合的过程有密切关联。在展开这些问题以前，有必要对西南边疆与中原的互动历史进行若干回顾和梳理。

云贵高原地形呈西高东低走势，西接青藏高原横断山脉，北临四川盆地，东连东南丘陵，南

<sup>1</sup> 本文原载于《中国民族报》2018 年 1 月 6 日理论版。因报刊文章注引从略，特此说明。

<sup>2</sup> 作者苗族，日本东京大学博士、日本学术振兴会博士后；现任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教授。



出东南亚和南亚诸国，总面积约 50 余万平方公里；境内群山连绵，河流纵横，温暖潮湿。历史上，云贵地区在中央王朝国家的地缘政治格局中的位置十分重要：对中国的整个西南地区而言，云贵高原紧邻最富庶的、素有“天府之国”之称的四川盆地，构成一道天然的地理屏障，云贵宁则川蜀安；云贵高原是中国南出西向东南亚、南亚地区陆路通道的必经之地，在北方“丝绸之路”开通之前，四川就与云南及东南亚等地频繁发生了民间商贸往来。秦汉时期，中原王朝征服了云贵高原上的“西南夷”，进行政治经营。此后一千多年间，云贵高原地区虽然大部分时期属于中原王朝的势力范围，但关系一直不太稳定，直到元王朝于至元十三年（1276 年）设立了云南行省，才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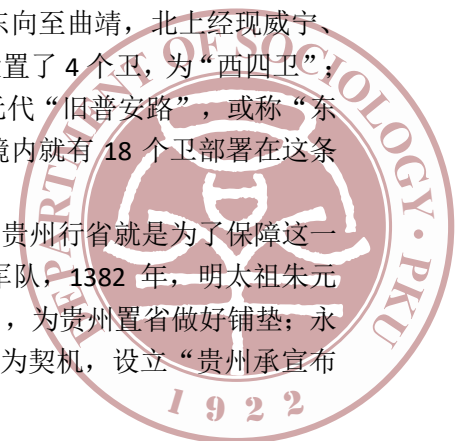
总的来说，影响云贵地区与中央王朝政治关系发展的原因是复杂的，如中央王朝的朝代更迭、割据与统一等等，但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是交通。由于云贵高原地区地形地貌多变，群山连绵，域内族群众多，自然地理和社会状况都十分复杂。每当国家的力量尝试进入这一区域，必然要耗费庞大的资源来疏通和维护交通线。唐宋以前，中原王朝主要是通过“五尺道”“灵关道”等，依托四川的资源来控制云贵地区。然唐宋以后，中国政治中心东移、经济中心南下，江浙和湖广地区经济崛起，至元代时，“湖广熟，天下足”之谚已流传四海。而此前被视为“天府之国”的巴蜀之地，在元与南宋的战争中首当其冲，人口剧减。直到清朝中后期出现史称“湖广填四川”的大规模移民后，四川的人口和经济才逐渐恢复。这一变迁过程深刻地影响了云贵高原与中央王朝的互动关系。

元朝十分重视对云南边疆的经营，在民族地区广泛推行“土司制度”。但由于上述中国整体地缘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依托四川已无力支撑对西南边疆的治理。在这种状况下，至元二十八年（1291 年），元王朝新开辟了由云南直达湖广的“普安道”（明称“东路”“一线路”），由中原地区进入云南，不再绕道四川或广西，而是取直道从湖广过贵州至云南，缩短了千余公里路程。在建省前，贵州是大小土司割据和苗瑶、壮侗、藏缅语族的各少数民族的分布地域，境内的苗岭山脉是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的分水岭，地表切割严重，土地资源匮乏，故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自“普安道”开通后，贵州地区由数省包夹下的“蛮荒之地”一跃成为湖广内地进入西南边疆的门户。道路开通后的第二年（1292 年），元王朝便整合贵州各地的大小土司设立了“八番顺元宣慰司”，这是后来贵州建省的肇始。

明王朝建立后，更加重视对西南边疆的经营。1382 年朱元璋征服云南后，为防止土司和少数民族的反抗，将大批军队部署在内地进入云贵地区的交通线上，设置卫所屯兵驻扎。卫所是明代独创的军事制度，按定制每卫兵额为 5600 人，下设若干千户所、百户所；士兵逢战事调发从征，无事则务农自养。一些学者认为，云贵地区卫所的兵员数实际远超定额，有的达数万人之多。这些士兵都携带家属，还有大量汉人移民以“民屯”“商屯”等形式进入西南边疆，以致在云贵两省，汉人的人口均达百万以上。

汉人移民进入西南地域后，基本沿着明王朝布防驻守的三条“官道”分布：一是由昆明北上经四川会理和大小凉山地区至四川成都的“建昌道”，明代在这条线上建立了 5 个卫，8 个所，俗称“五卫八所”，并专设“四川行都护使司”管理；二是从昆明东向至曲靖，北上经现威宁、毕节、赤水至四川泸州的“乌撒道”，亦称“入滇西路”，这条线上设置了 4 个卫，为“西四卫”；三是由昆明经曲靖、富源，一直向东横跨贵州境内进入湖广地区的元代“旧普安路”，或称“东路”，这条线路因连接云南与湖广，明王朝沿路重兵布防，仅贵州境内就有 18 个卫部署在这条驿道上。

这三条通道中，由湖广经贵州入云南的“东路”尤为关键，甚至贵州行省就是为了保障这一条进西南的交通线而设置的。为统一管理部署在贵州境内的卫所及军队，1382 年，明太祖朱元璋刚一征服云南，就先于云南成立了省级军事机构“贵州都护使司”，为贵州置省做好铺垫；永乐十一年（1413 年），明成祖以镇压黔东思州、思南田氏土司叛乱为契机，设立“贵州承宣布



政使司”。由此，贵州正式进入明朝十三行省行列。如此，一国政府因保障交通线而专置一省级机构，即使在世界历史上也是非常罕见的。明中期以后，昆明至成都的“建昌道”因“夷患”猖獗发生阻塞；云南至四川泸州的“乌撒道”虽然通畅，但进入湖广走长江水道，顺水行疾而逆流至难；另两条道路，即至广西道和旧五尺道，因无兵驻守，“匪盗成群”，无法畅通。至此，朝廷只能通过经贵州的“东路”驿道来维持云南这一疆域，可谓“千里一线孤悬”。这条驿道被称为“一线路”，名副其实。

清朝对西南边疆的治理基本沿袭了明朝奠定的格局，并大力强化。自雍正朝开始，清王朝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大范围实施“改土归流”治策；对一些不服“王化”、亦无土司管束的少数民族地区则用兵“开辟苗疆”，在西南边疆普遍建立了府、州、县流官统治体系，为清中后期大量内地汉人移民进入西南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也是在这一过程中，“苗疆”开始作为一个具有特定内涵的地域概念出现在官方文献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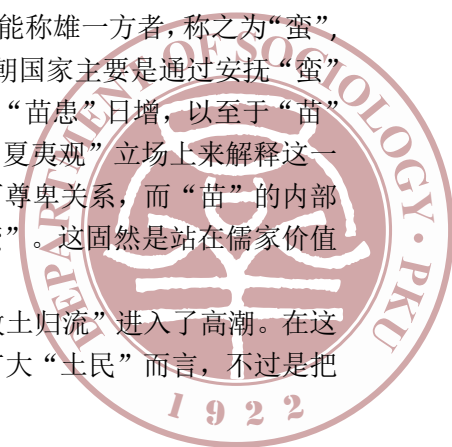
## 二、“苗”与“苗疆”：“国家化”进程中建构的“他者”

“苗”，与“蛮”“夷”类似，是近代以前中国主流社会对南方少数民族的泛称之一，今天的苗族只是其中一小部分。一般认为，除上古传说中的“三苗”外，与现今的苗族有关的“苗”字样最早出现于唐代樊绰的《蛮书》。其后南宋的朱熹在《三苗记》中也曾记录了湖南西南一带的“猫”及“苗人”的活动情况。到了元代，正史中开始出现“苗”的记录，从地域上来看主要指今湖南西部及西南部一带的少数民族。元末，在各地掀起的反元起义中，一支活跃在江浙地区号称“苗军”的勤王队伍引发了关注。其首领为湖南的土司，士兵都是来自湘西南一带的“苗蛮”。这支“苗军”的战斗力的极强，曾屡次大败张士诚等部，最盛时曾达 20 万人，一时为元朝廷所倚重，成为朱元璋等多部反元义军的大患。《明太祖实录》中关于这一时期朱元璋的言论和活动的记载，就频繁涉及到“苗军”，“苗”从明朝开始成为南方少数民族的泛称可能也与这段历史有某种关联性。

明朝统一西南后，沿湖广至云南的“旧普安路”密集建立卫所，屯兵守卫。由于这条线路在贵州境内所经之地几乎都是少数民族区域，内地来的汉人屯军面对陌生的异文化环境，就开始用“苗”来统称周边的少数民族。可以确定，“苗”作为泛称是与湖广通滇的这条驿道密切相关。如明代王士性在《广志绎》中就明确写道：“从辰沅（今湖南沅陵、芷江）至普安（今贵州安顺）两千里，总称曰苗”。到了清代，“苗”的指称范围进一步扩大到贵州全省及周边地区，区域内大多数少数民族的称谓以“苗”作为后缀，如“仲苗”（布依族）、“水家苗”（水族）、“洞苗”（侗族）等，故而贵州省有“百苗”之说。近代以后，“苗”进而取代“蛮”涵盖了中国的南方少数民族。著名学者梁启超甚至将中南半岛上的越南、缅甸、老挝也纳入到“苗”的范畴之内。直至新中国进行民族识别以后，“苗”才成为今天苗族的专称。

“苗”何以取代“蛮”？晚清学者魏源试图解答这一问题。他认为，“蛮”“苗”之别主要是由内部社会组织结构的差异造成的：内部有明确的上下、尊卑关系，能称雄一方者，称之为“蛮”，而内部无贵贱、无贫富、无君长，互不统属者称之为“苗”；过去王朝国家主要是通过安抚“蛮”来安抚和压制“苗”，只是后来“蛮酋”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才导致“苗患”日增，以至于“苗”取“蛮”而代之。在这里，魏源显然是站在传统的中央王朝本位的“夏夷观”立场上来解释这一问题的。在这一视野下，“蛮”的内部有等级结构，有君长，有上下尊卑关系，而“苗”的内部无明显的社会层级结构，所以“苗”比“蛮”更为“落后”和“野蛮”。这固然是站在儒家价值立场上作出的判断，但其实也受到当时现实因素的影响。

至清雍正时期，中央王朝自明清以来在云贵等地陆续实施的“改土归流”进入了高潮。在这一过程中，对土司地区的“改土归流”总体上较为顺利，因为对于广大“土民”而言，不过是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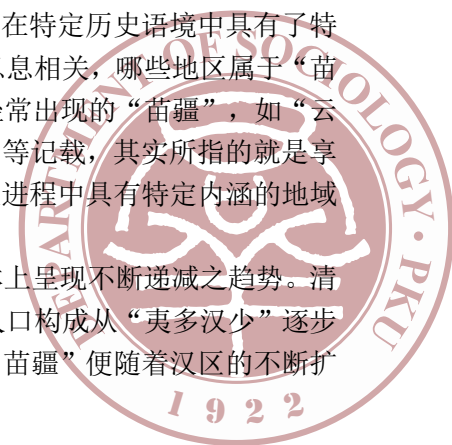
交税的对象由“土司”换成了“官府”，其社会结构并未受到太大冲击；但在若干既无官府治理、又无土司约束的“生苗地界”，如黔东南及与湘西交界处的腊尔山周边地区、黔东南境内的清水江和都柳江流域等地，各村寨互不统属，社会层级不甚明显，国家力量进入这些区域缺乏关键的中介力量，无法像土司辖区那样通过层级进行治理，往往“按下葫芦浮起瓢”，最后只能采取军事手段对各个村寨逐一征服。这一军事征服过程被称之为“开辟苗疆”。后来的“苗民”反抗也主要起自这些区域，且持续不断，以至有“三十年一小反，六十年一大反”之说。因而，随着“苗患”日增，“苗”的问题越来越受到王朝统治者的关注，“苗”的指称范围也随之不断扩大。换言之，如果从国家治理的需求和策略看，这些被视为“化外之地”的区域由于缺乏明显的社会层级，反而不利于进行疆域治理。因此，清乾隆时期，在镇压了这些“苗民”叛乱后，清王朝一方面承认其有限自治，规定“嗣后苗众一切自相争讼之事，俱照苗例归结，不必绳以官法”，另一方面又试图培育出社会层级关系，反而在这些区域新设了许多小土司。在这一过程中，“苗疆”字样开始频繁出现在清代的官方文献中。

从现有的文献可见，“苗疆”一词在明代就已出现，但使用频率极低，内涵也很模糊。在明代，对于上述“化外之地”多称之为“苗界”“生界”或“生苗地界”，用“界”而不用“疆”来指称这些地域。进入清代后，清王朝在云贵地区逐渐推行府、州、县“流官”治理体制，需从内地派遣大量官员赴云贵任职。然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山高路远，条件艰苦，被视为畏途，屡屡出现官员不愿就任，甚至弃官举家潜逃的事件。为解决这一问题，康熙、雍正年间，朝廷在推行“改土归流”措施的同时，还制定了“苗疆缺”“烟瘴缺”“沿河缺”“沿海缺”等赴边远地区任职的官员待遇及考评制度。

从现有资料看，清王朝派往西南地区的官员岗位主要有两种：一是“烟瘴缺”，涉及炎热潮湿的艰苦山区，包括广西南部及云南部分区域；二是“苗疆缺”，主要涉及南方少数民族聚居的区域，所涵盖地域更广。从《清实录》的记载可见，乾隆早期属“苗疆”的地理范围，除贵州全省及云南的大部分地域外，西至四川西部的大小凉山地区，北至湖北湖南的武陵山区，含现恩施、襄阳、汉阳、宜昌等地，东至湖南中部，包括岳阳、长沙、湘潭、常德、邵阳、永州等地，南至广西中部和北部山区，包括河池、桂林、柳州、龙胜等地。大体上看，云南、贵州、四川、广西、湖南、湖北诸省，凡有少数民族分布的区域基本都被划入“苗疆”的范畴。按清朝官制，凡赴“苗疆”任职者，享受“边俸”待遇，在任期上“俱三年俸满，有政绩无差忒者，例即升用”。相比之下，内地为“腹俸”区域，任职者通常满五年才能考评。当然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如乾隆时期有官员奏报，许多至“苗疆”赴任的官员刚熟悉当地情况就被调离，不利于地方的长治久安，于是出现了在“苗疆”岗位上任期至八年者。此外，根据自然条件、地理位置、风土人情、经济状况等，“苗疆”属地还被划分为若干类型，官员的品级、待遇亦与之相应，各不相同。

上述事实表明，“苗疆”一词在清代的频繁出现，是与这一时期王朝国家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推行的一系列国家整合措施密切相关的。仅从语义上看，清代的“苗疆”，指的就是纳入国家府、州、县体制治理范围的少数民族地区，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苗疆”出现以前，这些区域不属于国家统治范围，而主要指的是国家治理方式的变更使“苗疆”在特定历史语境中具有了特定地域的含义。尤为重要的一点是，由于这项制度与官员个人前途息息相关，哪些地区属于“苗疆”，哪些地区属于“内地”，自然是很清楚的。所以清代文献中经常出现的“苗疆”，如“云贵川广等省苗疆地方”，“云贵两省均属苗疆”，“楚黔均为苗疆”等记载，其实所指的就是享受“苗疆缺”待遇的区域，“苗疆”因此成为一个在国家的疆域治理进程中具有特定内涵的地域概念。

另一方面，“苗疆”的涵盖范围在不同历史时期亦有变化，整体上呈现不断递减之趋势。清乾隆中期以后，随着汉人移民不断进入西南民族地区，云贵高原的人口构成从“夷多汉少”逐步变成了“汉多夷少”，加上各少数民族社会普遍出现了汉化趋向，“苗疆”便随着汉区的不断扩



展而收缩。查阅《清实录》可见，自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以后，湖南、湖北、广西等省便陆续上呈要求某辖内地方“删去苗疆字样”的奏本，如“思恩一府（今广西武鸣等地）……所辖猺獞，与齐民无异，请删去苗疆字样”，“永州府同知（今湖南永州市）……今已将苗疆字样删除”，“桑植（今湖南桑植县）删去苗疆字样”，“宝庆府（今湖南邵阳市）……与内地人民无异，请删去苗疆字样”等等。即使在处于“苗疆腹地”的贵州省，一些汉民比较集中的州县也申请删除“苗疆”字样。至晚清时，“苗疆”范围便基本收束至贵州及周边地区。而在原属“化外之地”的“湖南苗疆”和“贵州苗疆”，其地方文化保存得相对完整，反抗斗争仍持续不断。晚清时期的一些文献，如徐家干所著《苗疆闻见录》、严如煜所著《苗防备览》《苗疆村寨考》等，其所言“苗疆”便集中在上述地区，由于这些地区基本上是苗族聚居区，如此便逐步形成了“苗疆”等同于苗族聚居区的狭义范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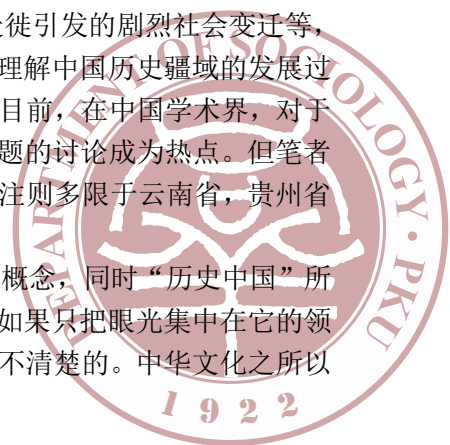
总体而言，明清时期，由中央王朝自上而下推进的“国家化”进程，成为了引发云贵高原少数民族社会发生剧烈变迁的主要原因和整体背景，而进入西南边疆地区的汉人移民事实上成为支撑这一进程的政治基础和依靠力量。“苗”作为非汉族群的泛称，以及“苗疆”作为地域概念，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中出现的。另一方面，国家权力和汉人移民进入西南边疆地区的重要历史进程，主要是通过湖广连接贵州和云南的“东路”驿道实现的，且整体上呈现出由东向西渐入和扩展的趋势。

2012年，笔者基于十余年的研究和思考，将湖广经贵州至云南的这条重要通道冠名为“苗疆走廊”。研究表明，“苗疆走廊”初为明清时期国家赖以控制西南边疆的首选、甚而一度是唯一的通道，继而又发展成一条贯通长江、珠江两大水系，勾连周边诸省的“陆路经济走廊带”。“苗疆走廊”沿线，城镇密集、人口集中、民族众多，对明清时期中国南方区域市场的一体化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苗疆走廊”是一条藉由国家力量开辟的汉人移民文化走廊，是一个具有浓厚的“国家化”特点、儒家文化与各少数民族文化交相辉映的“线性文化空间”。尤为重要的是，这是一条“活态的”文化走廊，历史上汉人移民的后裔至今仍分布在线路周边地区，有的融入到苗族社会中，有的形成了独特的地方性汉文化，如“屯堡人”文化等等；因“苗疆走廊”对于中国南方区域市场的贯通整合、地缘政治和经济格局的重组、民族交融及共生格局的生成等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功能和意义早已超出线路本身，且延续至今。笔者认为，通过上文对“苗疆”的讲述，再以“苗疆走廊”为抓手切入，这一思考路径对重构中国西南边疆史、理解中国“一体多元”格局的形成机制和历史过程，将提供一个难得的范本。

### 三、“双重华夷体系”：“历史中国”的立体呈现

纵观中国历史，如果说中原农业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间的对抗和互构是贯穿了中国数千年历史的主旋律，那么，“河西走廊”“南岭走廊”“辽西走廊”“苗疆走廊”则是深入理解中国历史疆域变化及“夏夷”关系的基本四维。其间，明清时期，王朝国家沿“苗疆走廊”自东向西往云贵高原地区推进的一系列“国家化”措施、大量汉人移民向西南迁徙引发的剧烈社会变迁等，因其时间晚近、状况复杂、文献丰富、活态文化可循，对于我们深入理解中国历史疆域的发展过程、重新审视传统的“夏夷观”等，都将提供内涵极为丰富的素材。目前，在中国学术界，对于“何谓中国？”、中国的历史疆域变化、边疆治理、“夏夷观”等问题的讨论成为热点。但笔者注意到，这些讨论聚焦的区域大多为北方游牧地区，对西南地区的关注则多限于云南省，贵州省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边疆学者的视野之外。

历史上的中国是一个整体，“中国”不仅是具有多重含义的复合概念，同时“历史中国”所呈现出的景象也是一种世界秩序或观念体系。这就好比我们看美国，如果只把眼光集中在它的领土范围，不谈其主导的美元体系、军事存在和全球秩序，实际上是看不清楚的。中华文化之所以



历经数千年延绵至今，正是基于某种相对稳定的、超越民族和国家存在的结构性体系。近代“金铁主义”倡导者杨度就从文化共同体的视角来理解“中华”，认为“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有亲疏之别”。也就是说，这一观念体系以注重等级次序的儒家“礼教”为核心，在东亚文明圈内具有某种普世性，是不可简单地还原到某个民族或国家身上的。否则，我们很难解释明末清初朝鲜半岛上兴起的“小中华思想”、日本列岛上幕府将军自封为“征夷大将军”、明治维新早期发生的“尊王攘夷”运动等。换言之，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夏夷观”等，本身就内隐着“一体多元”的政治理想与追求，它不仅为中原汉民族所有，同样也内化到周边民族和国家中。所以，历史上即使外族入主中原，其传统的“延续性”也不会因之发生断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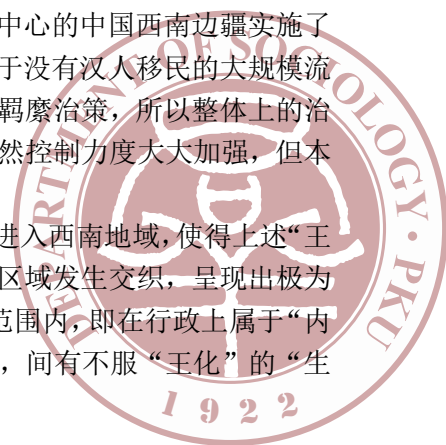
就西南地区与中央政权的互动关系而言，元、明、清时期，无论由哪个民族主导中央王朝，都展示出这种“延续性”的清晰脉络。也就是说，元、明、清时期，王朝国家治理西南边疆地区的总体趋势是一个由间接统治转化为直接统治的“国家化”过程。这里所谓的“国家化”，主要指的是中央王朝在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自上而下地对边疆地区进行的“一体化”整合过程。在这一进程中其实有两条不同的“华夷之辨”界线交织在一起，笔者称之为“双重华夷体系”。

这里所说的“双重华夷体系”，指的是构成传统中华世界的两条重要边界及其互动的弹性体系。这两条边界一是“王化”边界，也可称为构成中华世界的政治边界或外边界，主要指的是以皇权为顶点，由中央王朝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区域，其构成了广袤的“疆域”和“版图”的空间。二是“教化”边界，也可称为文化边界或内边界，主要指以汉人为主体的内地。历史上中原王朝对周边地区的整合，往往先是通过“王化”构建其模糊的政治空间，形成外边界，再通过“教化”徐徐扩展其内边界范围。

换言之，由“天下观”彰显出的传统“大一统”思想，其政治秩序与意识形态既建构在“文明”与“野蛮”对置的“华夷之辨”的基础上，但同时其疆域又包容不同生态、不同文化的族群，形成了政治上“一体”、文化上“多元”的共生形态。每当王朝国家的势力强盛之时，往往通过武力征服、羁縻制度、朝贡关系等手段，可以把外边界范围扩展得很大，构建起“一体多元”的中华世界。然而当中原王朝国家势力衰退之际，外边界范围可以不断收缩，有时甚至退至内边界内。所以，在中国历史的变迁过程中，往往外边界，即政治边界受势力兴衰、朝代更迭的影响比较模糊且流动性较大；相对而言，以定居农业为主的“内地”农耕地区，即内边界区域，无论哪个朝代，都是提供赋税劳役等的税收来源地，域内的户口、土地，理论上都要经过调查统计以确定每户承担的税额和劳役，所以农耕区与非农耕区（通俗而言，相当于今天的征税区和免税区）的界限是相对明晰和稳定的。从这一意义上说，所谓的汉人，并非是当今意义上基于血缘世系想象的“民族”，而是深受儒家观念熏染（即“教化”），接受皇权统治（即“王化”），并自觉为国家提供赋税劳役的群体。即使是主要由少数民族治理的元王朝或清王朝，支撑其统治的经济、政治基础，一样是由内边界界定的农耕区。中华文明之所以数千年来延绵不绝，我认为相当程度上正得益于这一极富弹性的结构体系。

从这一视角看，早从秦汉时期开始，中央王朝就对以云贵高原为中心的中国西南边疆实施了一系列的政治开发措施，这些都可理解为一种“国家化”过程。但由于没有汉人移民的大规模流动，其政治和经济都以四川盆地为支撑点，实施的是“以夷制夷”的羁縻治策，所以整体上的治理是不稳定的。元代在征服云南大理政权之后推行“土司制度”，虽然控制力度大大加强，但本质上仍与历代的羁縻治理方式一脉相承。

明清时期，西南地区最值得关注的历史进程就是汉人移民大规模进入西南地域，使得上述“王化”的政治边界（外边界）和“教化”的文化边界（内边界）在这一区域发生交织，呈现出极为复杂的状况。首先，云贵高原地区虽然在行政区划上置于各行省管辖范围内，即在行政上属于“内地”，但其域内既有沿交通线分布的“汉区”，又有土司控制的区域，间有不服“王化”的“生





苗地界”。笔者将此称为“内地化边疆”现象，这一现象显然很难用通常而言的“内地/边疆”这种二分法来予以说明或解释。其次，明初朱元璋针对云贵地区发布的上谕中，虽然屡屡使用“中国”一词，但显然其边界限于汉人移民分布地区；进而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元朝廷在制定各藩国朝贡礼仪之际，把云贵等地的土司辖地与日本、朝鲜等同列，统统将其纳入“朝贡”对象中。也就是说，云贵地区在政治上位于行省范围内，毫无疑问是中国的组成部分，在中国的疆域和版图之内；但同时，在文化上又表现出其不同于中原文化的多种形态，因此有关“苗疆”、“生界”、“化外之地”、“边防”之记载所划出的边界，其实都是属于“教化”意义上的表述，反映出“历史中国”概念的多重性及丰富内涵。

晚清以后，在西方民族国家理念的影响下，中华帝国模糊的疆域开始固化为清晰的领土边界，但中国历史上形成的“一体多元”结构仍然被今天的中国所继承，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体制是现代中国的基本国情和最重要的特征。这种“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共生结构依然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最具生命力的部分，也是近代中国在世界格局的剧烈变迁中仍然维系国家统一的最重要基础。

近代以来，“历史中国”的这种整体性便不断受到西方分析话语的肢解和割裂。在强大的西方话语的影响下，避讳谈“疆”、强调“自古以来”也成为“弱者”抵抗的“武器”。旁观近年来有关“内亚视角”“新清史”的争论，笔者认为：无论研究主体、研究视野、研究史料如何变换，但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那就是历史上的中国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性体系，中华文化主导东亚文明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学者可以“横看成岭侧成峰”，可以从多个视角切入进行历史阐释，但如果连既存的事实也否认，用“本部/藩部”等这样一些本来互为一体的概念来切割“历史中国”的整体性，其结论也只不过是“盲人摸象”罢了。

“苗疆”作为一个在特定历史语境中具有特定内涵的地域概念，虽已离我们远去，但其意义并非仅存于故纸堆中。今天的“苗疆”仍被视为中国大地上的一块神奇之地，经由诸多文学艺术作品的描述，散发着异样的芬芳，悄然拨动着我们的心弦。重返“苗疆走廊”，对我们深入理解西南地区各民族“一体多元”共生格局形成的过程，推动地方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论 文】

### 明代“苗疆走廊”的形成与贵州建省<sup>1</sup>

曹端波<sup>2</sup>

摘要：明代贵州建省为中国历史上西南政策的重大转型。明洪武、永乐时期因一条路，即云南入湖广“一线路”，而在贵州建省，极大地改变了西南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明代贵州“一线路”是国家在战国秦汉以来对西南经营的基础上形成的，特别是宋元时期江南、湖广经济中心的确立和云南经济的发展。明代为了构建国家从西北到西南的整体国家防御体系，构筑一条自湖广经贵州至云南的“通道”，将云南与中南、江南联结起来，这一“通道”经历史演变，形成西南至内地的“苗疆走廊”；不仅西南纳入全国经济圈，也开启了西南非汉族群内地化的进程。

关键词：明代 苗疆走廊 贵州建省

<sup>1</sup> 本文为“贵州大学211三期工程重点课题（项目号：211AMZQ006）”阶段性成果。

<sup>2</sup> 作者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贵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西南少数民族史研究。



中国历史上最高行政区的建立不仅仅是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使然，还有政治因素在内，即该区域因在国家政治地理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国家为达到政治的稳定而设置管理机构。明洪武十五年（1382），设置“贵州都指挥使司”，永乐十一年（1413），设置“贵州布政司”，永乐十二年（1414）设置“贵州按察司”，这样，明帝国在贵州建立了完整的地方最高政区系统：军事化都指挥司系统、民政的布政司系统、按察职能的按察使司系统。明代贵州建省，已有学者论述，但很少从宋元以来，西南政治地理格局的转变和明代西南政策的视角探讨作为西南腹地的“贵州”建省的政治经济原因。本文试图从明代贵州建省的主要原因，为建立一条从“湖广”经“贵州”到“云南”的“通道”而在贵州设立最高地方政区，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西南至内地的“苗疆走廊”，来探讨元明时期贵州在中国政治地理格局的变迁。

## 一、

对于“贵州建省”，明清时就有学者、官员进行探讨。明代李化龙在平播时《请罢开矿疏》中指出：“夫贵州何地，此时何时，而尚可为此事乎？盖贵州原非省会，只以通滇一线，因开府立镇，强名曰省。其实皆高山峻岭，军民无几，尚不能当他省一大府，有何名马方物，其谁不知之？彼武弁贫窘无聊，又见各省俱有税使，以为贵州虽称瘠薄，然但得诳奏圣明，奉旨征税，传食万里，逍遥数月。计至彼处，即不如额，且可充囊，此不过为身家之计耳，岂复有一毫为国之心乎？夫使其为往日之贵州也，止于无税而已。”<sup>[1]</sup>（卷1《奏议》）李化龙在奏疏中指出了贵州建省的特殊性，“只以通滇一线”，因此在贵州建省，至于其本身的经济实力还达不到其他省份的府级政区。王士性《广志绎》曾对贵州“一线路”状况给予较准确的描述：“出沅州而西，晃州即贵竹地；顾清浪、镇远、偏桥诸卫旧辖湖省，故犬牙制之。其地止借一线之路入滇，两岸皆苗”，“西南万里滇中，滇自为一国，贵竹线路，初本为滇之门户，后乃开设为省者，非得已也”<sup>[2]</sup>（P324-325, 333）。国家在贵州开辟一条道路，“借一线之路入滇”，其目的在于连通云南和湖南，使云南与中国核心经济区联系起来。郭子章《播平善后事宜疏》对于作为“通道”的贵州说得很清楚：“贵州四面皆夷。中路一线。实滇南出入门户也。”<sup>[3]</sup>（卷419）

贵州为西南腹地，是联结云南与中南，巴蜀与两广的枢纽，其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论述贵州形势时指出：“尝考贵州之地，虽偏隅逼窄，然驿道所经，自平溪、清浪而西，回环达于西北，几千六百余里。贵阳犹人之胸腹，东西诸府卫犹人之两臂。然守偏桥、铜鼓以当沅、靖至冲，则沅、靖未争也；踞普安、乌撒、以临滇、粤之郊，则滇、粤不能难也；扼平越、永宁，以拒川蜀之师，则川蜀未敢争也，所谓以守则固矣。命一军出沾益，以压云南之口，而以一军东指辰、沅，声言而下湖南，而卷甲以趋湖北，武陵、澧阳不知其所守。膺击荆南，垂头襄阳，而天下之腰膂已为吾所制矣！一军北出思、黔，下重庆，敌疑我之驰萌也。问途沔北，顾盼长安，而天下襟吭且为我所矣！所谓以攻则强矣！”<sup>[4]</sup>（卷11《贵州方舆纪要序》）

贵州作为西南交通枢纽于战国秦汉时期就引起了国家的重视。如战国时期，楚与秦争夺西南地区霸权，楚国将军庄蹻即沿长江水道而上，经贵州进入云南，“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庄蹻者，故楚庄王苗裔也。蹻至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sup>[5]</sup>。庄蹻经黔中郡到达云南，也因秦夺取黔中郡后，“道塞不通”，回不了楚国。汉武帝时，因湖南、江西一带水道太多，阻碍了因不熟悉水战的北方汉人，“今以长沙、豫章往，水道多绝，难行”<sup>[5]</sup>；因此派唐蒙开通巴蜀经贵州至岭南的“古夜郎道”，“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馀万，浮船牂柯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诚以汉之强，巴蜀之饶，通夜郎道，为置吏，易甚”<sup>[5]</sup>。



作为大一统的秦汉帝国，对西南的经营交往积极，但由于云贵川交界地带，特别是贵州，“地无三尺平”，非汉族群复杂，导致国家积极倡导的“官道”流于失败。司马迁对此进行了较详细的记载：“当是时，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戍转相饷。数岁，道不通，士罢饿离湿死者甚众；西南夷又数反，发兵兴击，耗费无功。上患之，使公孙弘往视问焉。还对，言其不便。及弘为御史大夫，是时方筑朔方以据河逐胡，弘因数言西南夷害，可且罢，专力事匈奴。”<sup>[5]</sup>汉武帝经营巴蜀经贵州至岭南的“官道”失败了，并不能否认民间商路的存在。由巴蜀经长江水系如赤水河、乌江等进入贵州腹地，再经牂牁江到达番禺的民间商路把贵州纳入全国体系。

民间商路不仅仅沟通巴蜀、两广与贵州的经济，而且影响了贵州的文化和生活。沿此商路发现大量的汉代考古遗址可证巴蜀文化对贵州乃至广西巨大的影响，如黔中一带的安顺、清镇、平坝等地挖掘的汉墓葬品与巴蜀、广州一带相似，“清镇、平坝所出土的土坑墓，其形制与四川巴县冬笋坝出土的汉墓有许多类似的地方。砖墓的结构，较之湖南耒阳花营1号墓和广州、四川等地的同时期墓葬，相同的地方也很多”，“出土的大批方格纹陶器，与广州华桥新村西汉墓出土的大致相同。这种方格纹陶器，主要出土于土坑墓中。铜器中的铜瓶与湖南长沙月亮山汉墓出土的一件相比较，花纹布局是一致的。漆耳杯的铭文，与朝鲜乐浪出土的广汉郡漆耳杯同一体裁。五铢、大泉五十、货泉等都为王莽时期的钱币。更重要的是漆耳杯上的铭文，告诉了我们元始三年的可靠年代”<sup>[6]</sup>；黔西汉墓墓葬形制和结构与清镇、平坝的东汉墓基本相同：砖室墓的几何纹花砖在清镇、平坝和赫章东汉墓中亦有发现，并且极为相似；随葬品中的铜镜，具有典型的东汉风格，这种铜镜以前在清镇23号墓（东汉）中发现过，纹饰是相同的；抚筓俑、扶耳俑无论服饰和形态都与贵州赫章东汉墓、四川牧马山东汉崖墓、洛阳烧沟23号墓的陶俑极为相像；另外铜釜、料耳当、银手镯和戒指之类的器物，也是在清镇、平坝东汉墓中常见的<sup>[7]</sup>。据考古发现，贵州汉墓的分布明显呈线性，如黔西甘棠的汉墓呈东西方向，而南北方向还未发现汉墓遗址<sup>[8]</sup>。

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南大姓崛起，形成割据，民国《贵州通志·前事志》卷4“南宁蛮爨瓚窃据宁州”条记载：“梁太清中，宁州刺史徐文盛以勤王征还江陵，东土丧乱，遂不除刺史。武陵王纪据蜀，别用陈智祖为宁州，旋随纪东下。土人爨瓚窃有宁州，遥属于周。惟牂牁谢氏为梁、陈守。梁、陈遂不能有夜郎郡，惟就其侨民置夜郎郡于辰阳。”<sup>[9] (P200-201)</sup>隋文帝时，黔中大姓开始臣服，“隋文帝开皇二年（582），以田宗显为黔中太守，征宁州刺史窦定荣为左武侯大将军，以韦冲为南宁州总管。冲至南宁，渠帅首领皆诣府参谒。三年，爨瓚遣使朝贡，命韦冲以兵戍之。置恭州、协州、昆州，以爨瓚为昆州刺史”<sup>[9] (P218)</sup>。

作为巴蜀经济区南北的贵州，因有水路从巴蜀直达黔中一带，历史上不断有巴蜀移民进入黔中。隋建立政权后，益州总管梁睿请讨南宁，并上疏：“拓土开疆，王者所务。南宁州，汉代群舸之郡，其地饶沃，多是汉人。既饶宝物，又出名马。今若往取，仍置州郡，一则远振威名，二则有益军国。其处与交、广相接，路乃非遥。汉代开此，本为讨越之计。伐陈之日，复是一机，以此商量，决谓须取”<sup>[9] (P217)</sup>。梁睿征讨贵州的理由在于贵州为巴蜀与岭南的交通要道，且这一“通道”上分布有大量汉人，战马也较多，能够为国家增强力量。

唐代，贵州境内大姓臣服者增多，国家在贵州开通了巴蜀至广西的“官道”。唐高祖武德三年（620），牂牁大姓，谢氏入朝，“昆明东九百里，即牂牁国也。牂牁，东距辰州二千四百里，其南千五百里即交州也。无城郭，土热，多霖雨，稻粟再熟。无徭役，战乃屯聚。刻木为契，盗者倍三而偿，杀人者出牛马三十。首领谢氏，至龙羽有兵三万。武德三年，遣使者来朝，以其地为牂州，拜龙羽刺史，封夜郎郡公”<sup>[9] (P234)</sup>。唐贞观时期，黔中大姓入朝者增多，如东谢酋长谢元深、南谢酋长谢强、西赵夷子蛮等。贞观十三年（639），侯弘仁由重庆出发，打通了巴蜀经贵州至广西的通道，“渝州人侯弘仁自牂牁开道，经西赵出邕州，以通交、桂。蛮、俚降者二万八千余户”<sup>[9] (P244)</sup>。

宋代广西买马路也是利用自广西经贵州到云南的传统民间商路为基础，因此，经营广西买马



的西南本土商人多为贵州一带的商人。南宋时期，国家加强了对贵州东部非汉民族区域的经营，其发展路线主要是从长江水系的支流，如乌江、沅水而上，利用河谷地区有利于水稻耕作区进行军屯。嘉定五年（1178），臣僚上言：“辰、沅、靖等州，旧尝募民为弓弩手，给地以耕，俾为世业。边陲获保障之安，州县无转输之费。”<sup>[10]（卷394《蛮夷二》）</sup>正是因为宋在贵州东部的经营，贵州东部镇远等地成为元与宋争夺的重要战场，“十二年（1275），（朱国宝）进兵临岳州，与宋兵战于岳之桃花滩，获其将高世杰，进昭信校尉、管军总管。既降湖右，加宣武将军，统蒙古诸军，镇常德府，知安抚司事。时宋诸郡邑多坚守不下，国宝传檄招谕，逾月悉平，惟辰、沅、靖、镇远未下。宋将李信、李发结武冈洞蛮，分据扼寨，国宝击败之，其众退保飞山、新城。思、播蛮来援，国宝复与战，破之，擒张星、沈举等三百余人。进攻新城，获信、发等，献俘江陵。行省奏功，赐金虎符”<sup>[11]（卷165《朱国宝传》）</sup>。

## 二、

作为西南腹地的贵州，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主要在于“通道”。万历《贵州通志》记载：“黔于《禹贡》为梁州之境，殷为鬼方，周为鬻、微、羌、巢之类，汉为牂牁郡，而迤西稍入犍为，迤南稍入益州，迤东稍入武陵。自汉以来，代多羁靡，未有若我国家收之幅员之内，一视之而树之屏者，此我太祖再造区宇，绍统古先帝王而非求多也。今日之黔，东则楚，西则滇，北则川，南则粤，是腹心而咽喉也。或者不深惟祖宗用变之初意，猥以其地之瘠、道之险而漫言羁靡，空谈干羽，则三旬之师，三年之克，帝王何乐与远夷区区争一顺逆者？可以长思矣。”<sup>[12]（卷1《省会志》）</sup>贵州省级行政区的设置并非是与远夷争一顺逆，而是因为贵州是大西南的“腹心”和“咽喉”。

“贵州”作为地方最高政区的出现是为一条路，即湖广经贵州至云南的“入滇路”。因一条路而设置地方最高政区以维护之，这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明代为何要一改前代西南政策，要打通贵州“一线路”和设置贵州最高政区呢？这需要从元明时期，中国政治地理格局的变化和国家整体边疆防御体系来说明。对于云南古代的对外交通，有许多学者进行研究和探讨，取得了较大的成果。但人们对于湖广经贵州至云南的“一线路”要么忽视，要么没有将此“通道”与贵州建省结合起来，没有从这一条新的“通道”来探讨明代西南政策的转型。

贵州建省是专为“滇”而设，因此，探讨贵州建省，必需从云南对外交通和政治地理格局进行探讨。明代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4“入滇三路”记载：“入滇路有三道：自四川马湖府以至云南府属之嵩明州，又自四川建昌行都司履之会川卫，以至云南武定府，是为北路；自广西之田州府至云南之广南府，由广南之广西府，是为南路；其自湖广常德府入贵州镇远府，以达云南之曲靖府，是为中路，则今日通行之道也。”<sup>[13]（卷24《外郡》）</sup>明代云南与中国内地的“通道”有三条，即入蜀、入桂、入黔三路，作为湖广经贵州至云南的中路是明代通行之路，而四川路线和广西路线几乎处于停滞，“蜀中粤西两路，久已荆榛，仕人以至差役不复经由。惟建昌为滇抚所辖，尚有商贾间走此捷径者，亦千百之一耳”<sup>[13]（卷24《外郡》）</sup>。

明代专门依赖贵州“一线路”，史载明确；明清时期很多人已经注意到明代专门依赖“贵州路线”的不合理性，主张改变这一情况。如《万历野获编》记载明代云南举人杨提等上疏，“请辟牂牁故道，由省城竟抵广西田州，由富川以入三江口，便可从大江直抵南都，亦可以陆路竟达常德府。其路较今走贵州者凡近三千余里，且列其便有五”，即主张改走“广西路线”，然而，由于开辟一条新路，不仅要增加大量经费，而且涉及西南政策的格局，“盖贵州本罗施鬼国，特以通滇一线，强名省会，水西安氏，力任邮传，以故声息时闻，不敢狂逞。若黔路一塞，则普安以东，便成荒徼，安氏且据为橐中物矣。即使安氏世守臣节，而四川马湖以西，建昌以南，俱土司错壤，广西之田州亦土官也。其犷悍难制与水西等耳，故谈滇事者，谓不如仍由黔之便”。比较起来，“广西路线”还不如“贵州路线”方便；后来，工科给事王元翰建议多方疏通云南对外“通

道”，“谓云南去京万里，往来仅黔中一丝，滇境西有金沙江，可一苇直达四川之马湖，西有西粤一路，由普安至田州，皆不过添设数驿，涂平水稳，既可以通金陵，又可以出荆襄，亟宜疏辟以广入滇之道，由黔、由粤、由蜀，又水路由江，四途并进，则土司诸夷自失其负固之势，可不烦征剿”，但其结果也是“其疏留中，盖元翰亦滇人，其说亦犹之杨提也。庙堂寝阁，迄今不行”

[13] (卷24《外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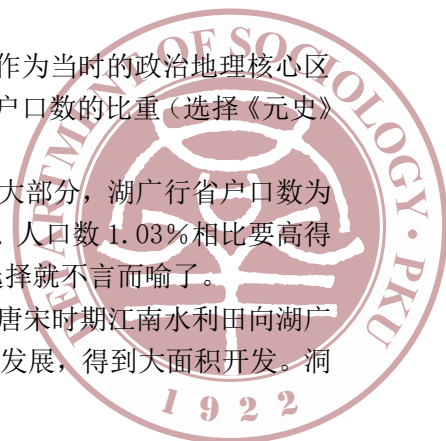
明代由于各种条件和湖广经济区对西南的作用，使云南单一地依靠贵州“一线路”格局难以改变。清代，由于西南交通网络体系更为发达，清代学者注意到其他交通路线的重要性。清代学者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对云南形势进行了分析：“云南古蛮瘴之乡，去中原最远。有事天下者，势不能先及于此。然而云南之于天下，非无与于利害之数者也。其地旷远，可耕可牧，鱼盐之饶，甲于南服。石桑之弓，黑水之矢，猺、獠、爨、僰之人，率之以争衡天下，无不可为也。然累世而不一见者，何哉？或曰：云南东出思、黔已数十驿，山川间阻，仓卒不能以自达故也。吾以为云南所以可为者，不在黔而在蜀。亦不在蜀之东南，而在蜀之西北。元人取道泸州，置驿于永宁、赤水之间，盖用蜀之东南。明初取道贵州，置驿于普定、普安之间，则又弃蜀而专事黔矣。大都邮驿之设，以京师为向背，而夺其径易之路，示以画一之途，亦制驭强索者，所有事也。沿袭渐久，遂徇耳目而废其心思。若谓云南要害舍黔中无足计者，是亦不知变也已。明初，规取云南，太祖谕傅友德曰：关索岭路，本非正道。正道又在西北，此亦不专事黔中之一验也。”顾祖禹认为云南对外“通道”需要多元化，特别是加强云南与巴蜀经济区的沟通，认为在加强秦汉时期四川东南与云南“通道”外，还需要重视云南与四川西北的“通道”，这一“通道”能够有效地打通西南与西北各族群的交通，“吾观从古用兵，出没恍惚不可端倪者，无如蒙古忽必烈之灭大理也。自临洮经行山谷二千余里，自金沙江济，降摩荻，入大理，分兵收鄙阨诸部，又入吐蕃，悉降其众。夫从临洮而抵金沙，亦不过二千里，行军于无人之地，更不事假道蜀中也。夫彼可以来，我何不可以往？设有人焉出丽江而北，招纳诸番，结以信义，径上洮岷，直趣秦陇，天下之视听，必且一易，以为此师从天而降也。”<sup>[4]</sup>(卷113《云南方輿纪要序》)

明代云南入黔“一线路”的形成成为元明之际中国政治地理格局所产生，而非明初朱元璋或其后来继任者一时的政策导致。贵州“一线路”萌芽于元代，耶律秃满答认为秦汉以来云南对外传统“通道”因水道险阻，所过道路不畅通，“窃见乌蒙迤北土僚，水道险恶，覆坏船只。黎、雅站道烟瘴生发，所过使臣艰难，人马死损”，因此于至元二十七年(1290)上奏，主张另建云南对外“通道”：“本省南接云南所管普安路见立马站，东建辰、沅、靖州站赤。已尝令总把孟皋直抵云南、湖广两省立站地界，相视得普安路迤东罗殿、贵州、葛龙俱系归附蛮夷，隶属四川省管下，可以安立四站。接连湖广省所辖新添地面，安立一站，至黄平、镇远，通辰、沅、靖州常行站道，以达江陵路。”<sup>[14]</sup>(卷19418)耶律秃满答所建议的“通道”较为成熟，一方面，湖广西部与黔中的“通道”已经存在(南宋时期，国家在贵州东部，特别是舞阳河、清水江通湖南的水道已建立)，并较方便；另一方面，在云南通往湖广西部的黔中族群已归附元帝国，因此建立云南经贵州到湖广的“通道”是可行的。耶律秃满答的主张很快得到中央政府的认可，将云南通普定路与辰、沅、靖州站赤联结起来。

元代需要开辟云南至湖广“通道”，其政治、经济原因在于湖广作为当时的政治地理核心区格局已经形成。如梁方仲所统计元代各省户口数、平均户口数及各省户口数的比重(选择《元史》记载数据)<sup>[15]</sup>(P178)：

根据户口数、人口数，江浙、江西、湖广等三个行省占了全国绝大部分，湖广行省户口数为全国的19.26%、人口数为15.83%，这与四川行省的户口数0.71%、人口数1.03%相比要高得多；因此，联结云南到中国内地的“通道”是进入四川还是湖广的选择就不言而喻了。

湖广地区的崛起，在于宋末战争中所受危害少于四川等地，加上唐宋时期江南水利田向湖广地区推广，原来北方汉族难以进入的湖区、河流沼泽区因水利稻作的发展，得到大面积开发。湖



庭湖湖区自南宋以来，水利田发展很快；元代，国家因江患而参与大型水利的整治：“洞庭北受江流，有虎渡、采穴、景沦、调弦诸口之水，而湖势益雄。然自古不闻江为湖害。自宋南渡之后，国家贫困，以荆南屯留之卒艺种民田，筑江堤，塞穴口，以等兵食，而水道一变，江患遂起。元大德九年，案口开疏，共计 6 处，江南江北分杀江势。”<sup>[16] (卷 46 《建置志》)</sup>湖广行省因水利稻作的扩展，使本区域粮食生产有了很大的提高，成为国家赋税和漕粮的重要来源之一。如大德十一年(1307)中书省因漕粮不继，令江西、湖广各运输 50 万石至北京：“常岁海漕粮百四十五万石，今江浙岁俭，不能如数，请仍旧例，湖广、江西各输五十万石，并由海道达京师。”<sup>[17] (卷 195)</sup>

省别	属县	户数	口数	户均口数	户数诸省比	口数诸省比
诸省总计	1, 110	13, 867, 219	59, 519, 727	4. 47	100. 00	100. 00
中书省	346	1, 355, 344	3, 691, 84	2. 72	9. 77	6. 20
岭北	—	—	—	—	—	—
辽阳	10	84, 756	461, 424	9. 28	0. 61	0. 78
河南江北	182	901, 956	4, 117, 737	4. 47	6. 50	6. 92
陕西	87	89, 839	769, 598	8. 57	0. 65	1. 29
四川	79	98, 538	615, 772	6. 25	0. 71	1. 03
甘肃	—	2, 312	32, 666	11. 62	0. 02	0. 05
云南	47	—	—	—	—	—
江浙	144	6, 326, 428	28, 736, 947	4. 89	45. 62	48. 28
江西	79	2, 337, 191	11, 674, 542	5. 00	16. 85	19. 62
湖广	136	2, 670, 351	9, 419, 625	3. 53	19. 26	15. 83
征东	—	—	—	—	—	—

湖广地区对于西南的地缘优势不仅仅在于湖广地区经济的发展，还在于元初湖广行省西部设立了屯军，已将湖广行省西部建设成为中南、西南非汉族群的治理中心。如湖广行省平章政事刘国杰在贵州、广西、广东与湖南交界处，继承宋代的治边方略，设置屯军，“辰、澧地接溪洞，宋尝选民立屯，免其徭役，使御之，在澧者曰隘丁，在辰者寨兵，宋亡，皆废，国杰悉复其制，班师。继又经画茶陵、衡、郴、道、桂阳，凡广东、江西盗所出入之地，南北三千里，置戍三十有八，分屯将士以守之，由是东尽交广，西亘黔中，地周湖广，四境皆有屯戍，制度周密，诸蛮不能复寇，盗贼遂息”<sup>[11] (卷 162 《刘国杰传》)</sup>。这些屯军主要为南北方向，长达 3000 里，东道广东，西到黔中一带，其国家力量对这些非汉民族渗透之广可以想象。贵州腹地的非汉族群及各政权经由湖广进入中国核心经济区便成为首选，如湖广至元二十九年(1292)，湖广省咨，八番罗殿宣慰司呈的文献可知，当时湖广西部“通道”已经成为西南非汉族群进入中国内地的主要“通道”：“见管地面相接云南交趾溪洞诸国，正系冲要驿路，相离本省往复七千余里，但遇使臣频并，站马不敷。今拟自岳州西抵镇远府，设立水站二十四处”<sup>[14] (卷 19423)</sup>。

### 三、

元代建立了以普安路为基础的云南经贵州至湖广的“通道”后，对以贵州为腹地的西南非汉族群的控制得到加强。在耶律秃满答儿建议修筑云南经贵州至湖广的“通道”前，元帝国军队已经对贵州境内非汉地方政权用兵，为“通道”的形成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如至元十七年(1280)，“以湖南兵万人伐亦奚不薛，亦奚不薛降”，“罗氏鬼国土寇为患，思、播道路不通，发兵千人与洞蛮开道”，并在黔中屯扎军队，“以征也可不薛军千五百复还塔海，戍八番、罗甸”<sup>[11] (卷 11 《世祖本纪》)</sup>。至元二十一年(1284)，当贵州北部、东北部与湖南西部一带非汉族群阻碍“通道”时，李忽兰吉奉旨进讨，并凿山开道，“时思、播以南，施、黔、鼎、澧、辰、沅之界，蛮獠叛服不常，





往往劫掠边民，乃诏四川行省讨之。曲里吉思、惟正一军出黔中，巴八一军出思、播，都元帅脱察一军出澧州，忽兰吉一军自夔门会合。十一月，诸将凿山开道，绵亘千里”<sup>[11]</sup>（卷162《李忽兰吉》）。

元代大德时期，因征讨八百媳妇国，湖广行省远征军即取道“贵州路线”，但由于远征军对贵州境内非汉族群征发过重的赋役，激起贵州土司及民众的反抗，“时刘深将兵由顺元入云南，云南右丞月忽难调民供馈，隆济因给其众曰：官军征发汝等，将尽剪发黥面为兵，身死行阵，妻子为虏。”众惑其言，遂叛”<sup>[11]</sup>（《元史》卷20《成宗本纪》）。贵州土司宋隆济、奢节（蛇节）反抗的主要原因在于湖广行省军队征讨八百媳妇国需要通过贵州，而作为通道的贵州，由于国家没有直接控制该区域，另远征军首领对当地赋役的加重，致使这一“通道”遭到当地族群的封闭。元代对云南对外“通道”沿线的屯田，对于加强国家对交通体系的控制起到重要作用，因此，国家往往对“通道”沿线的屯田较为重视。如乌撒宣慰司军民屯田，“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立乌撒路军屯，以爨焚军一百一十四户屯田。又立东川路民屯，屯户亦系爨焚军人，八十六户，皆自备己业”<sup>[11]</sup>（卷100《屯田》）。乌蒙等处屯田总管府军屯，“仁宗延祐三年（1316），立乌蒙军屯。先是云南行省言：乌蒙乃云南咽喉之地，别无屯戍军马，其地广阔，土脉膏腴，皆有古昔屯田之迹，乞发畏吾儿及新附汉军屯田镇遏。至是从之。为户军五千人，为田一千二百五十顷”<sup>[11]</sup>（卷100《屯田》）。黔中一带，则对普定路屯田较为关注，延祐七年（1320），“立普定路屯田，分乌撒、乌蒙屯田卒二千赴之”。

明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在征讨云南方案时就确定从两路进入云南，一路为主力，从湖广的辰、沅一带，经普定路进入云南；另一路则从四川经黔西北进入云南：“上御奉天门，命颖川侯傅友德为征南将军，永昌侯蓝玉为左副将军，西平侯沐英为右副将军，统率将士往征云南。友德等既受命，上谕之曰：云南僻在遐荒，行师之际，当知其山川形势，朕尝览舆图，咨询于众，得其阨塞。取之之计，当自永宁先遣骁将别率一军以向乌撒，大军继自辰、沅以入普定，分据要害，乃进兵曲靖。曲靖，云南之喉襟，彼必并力于此以拒我师，审察形势，出奇取胜正在于此。既下曲靖，三将军以一人提劲兵趋乌撒，应永宁之师。大军直捣云南，彼此牵制，彼疲于奔命，破之必矣。”<sup>[18]</sup>（卷139《太祖洪武实录》）洪武远征云南，即沿袭元代传统进入云南路线，傅友德主力军队即从湖南西部沿贵州路线进入云南东部门户“曲靖”。

从朱元璋对傅友德远征大军的安排可以看出贵州路线的重要性，因此，如何进入贵州，并保证行军路线的安全和后勤保障，为当时明帝国对西南经营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远征云南前，朱元璋就开始着手经营贵州。如朱元璋于1365年就开始封授贵州东部一带土司，“置思南宣慰使司。思南宣慰使田仁智遣其都事杨琛来归，欲并纳元所授宣慰使告身。上曰：溪洞，乃能识天命率先来归，可嘉也，俾仍为思南道宣慰使。授琛思南等处宣抚使兼新军万户，以三品银印给授之”<sup>[18]</sup>（卷15《太祖洪武实录》）。洪武四年（1372），黔西北、黔中一带彝族土司霁翠归附，在此基础上，朱元璋罢八番顺元宣慰司，设贵州卫，改顺元宣抚司为贵州宣抚司。贵州卫自洪武四年设置后，朱元璋在贵州，特别是在湖广经贵州至云南的“通道”上建立了一系列卫所，由此，贵州进入设立归顺国家的土司和建立国家直接管辖的军管区“卫所”的时期。

洪武五年（1372），在贵州境内设置贵州、播州宣慰使，“贵州宣慰领长官司七：水东、中曹、龙里、白纳、底寨、乖西、养龙坑。播州宣慰领安抚司二：草塘、黄平；长官司六：播州、余庆、白泥、容山、真州、重安”；并着力经营贵州中西部，为打通云南通道做好准备，“普定府女总管适尔及其弟阿瓮来朝，遂命适尔为知府，许世袭。安顺领州三：镇宁、永宁、普定；长官司六：宁谷寨、西堡、十二营、糜佐、募役、顶营”<sup>[9]</sup>（卷8，P9、15）。洪武八年，调成都后卫指挥佥事顾成守贵州，并在卫所修筑坚固的城池，“乃以卫指挥佥事顾成筑城以守，赋税听自输纳”<sup>[19]</sup>（卷316《贵州土司传》），对叛服不常的非汉族群进行征讨，“顾成调守贵州时，贵州群蛮叛服不常，成连岁出兵讨平之”；因此顾成有“顾老虎”之称，“贵州蛮叛，成连用兵破瓮蓬、瓮底、洪边、乖西等寨，斩获无算，降土贼王万全，而贼首龙小恩走死，蛮人慑服，目成为‘顾老虎’”<sup>[9]</sup>（卷8，P19-20）。

洪武十四年（1381）九月，傅友德远征云南大军从“贵州”、“乌撒”两路征讨云南，十二月，

傅友德主力大军进入湖广，作为主力大军的先锋指挥金事顾成很快平定普定、普安，并于洪武十五年（1382）正月设置贵州都指挥使司，“置贵州都指挥司，治贵州宣慰司，以顾成为使，其有司仍属湖广、四川、云南三布政使司”<sup>[9]</sup>（卷8，P26页）。贵州都指挥使司的设立，主要在于保障征云南大军的后方安全，保障远征军后勤供应基地湖广至云南“通道”的畅通。天启《滇志》卷4陆路列出了三条云南通川贵的道路，即“普安入黔旧路”“乌蒙入蜀旧路”、“建昌路”，其中前两条道路须经贵州都司诸卫所。普安入黔旧路的基本路线为昆明—平夷—普安州—安南卫—盘江—关索岭—安庄卫—普定—平坝—威清卫—贵州—龙里卫—新添卫—平越卫—清平卫—兴隆卫—偏桥卫—镇远府—清浪卫—平溪卫—沅州，即湖广至云南的道路，贵州都司的大部分卫所都分布在这一条线上。西北永宁、乌撒、赤水、毕节、七星关诸卫所分布在乌蒙入蜀旧路上，基本路线为昆明—霁益州—可度—乌撒卫—瓦店—黑张—周泥—七星关—毕节—层台卫—赤水卫—摩尼卫—普市所—永宁卫—永安—江门。这两条线路要经过除黄平等所外贵州都司绝大部分的卫所<sup>[20]</sup>（P495）。

朱元璋在平定云南前，鉴于贵州政治地理的重要性，设置了贵州都指挥使司，但贵州直到永乐时才设置布政司。贵州布政司的设立是永乐十一年（1413）在废除以黔东田氏土司的基础上建立的，“思南、思州相仇杀，始命成以兵五万执之，送京师。乃分其地为八府四州，设贵州布政使司，而以长官司七十五分隶焉，属户部。置贵州都指挥使，领十八卫，而以长官司七隶焉，属兵部。府以下参用土官。其土官之朝贡符信属礼部，承袭属吏部，领土兵者属兵部。其后府并为六，州并为四，长官司或分或合，厘革不一。其地西接滇、蜀，东连荆、粤”<sup>[19]</sup>（卷316《贵州土司传》）。贵州布政司设置之初，管辖区域较小，“分田氏地为思南、思州、铜仁、石阡，镇远、黎平、乌罗、新化八府，遂定设贵州布政司，以蒋延瓚为布政使，而以贵州宣慰司、金筑安抚司及新置八府属焉”；其权力也极为有限，“贵州开省在永乐十一年。田氏就擒，以思南三宣慰司地方改设六府，每府所属不过三四长官司，每长官司人民不过一二百户，官多民少。其地山峭地瘦，夷情猾诈，分隶川湖云南，壤地联络，冲胸掣肘”<sup>[9]</sup>（卷8，P69）。永乐十二年（1414），设贵州按察司，因而在贵州设置了完善的地方最高行政机构，“贵州，古彝蔡域，秦汉来羁縻而已，或稍稍郡县，终不能约束之就法度。皇明有天下，武功文教，无远弗及。洪武初，即贵州立都司，统军卫暨诸蛮长，永乐癸巳遂建布政司，悉州郡其地，间以宣慰、宣抚主之。越十八年庚子，乃设按察司以掌风纪，置按察司副使金事五员，分巡贵宁、安平，新镇，思仁四道”<sup>[9]</sup>（卷8，P69页）。

明代在贵州建省，主要在于贵州在西南交通体系中的地理位置，是沟通西南经济区与中南经济区、江南经济区的纽带。贵州在元明以前属于巴蜀经济区，从交通上也与巴蜀经济中心成都较为方便；元明之际，形成了巴蜀至贵州、湖广至贵州的两条交通线。如洪武四年（1371），负责西南军务的李文忠上奏：“贵州今隶湖广，而其地在成都西南，计成都水路至重庆三十六驿，重庆陆路至播南九驿，播南陆路至贵州五驿，凡五十驿。贵州由播南、思州界至沅州以达辰溪二十一驿，辰溪至湖广一十六驿，凡三十七驿，比之成都至贵州水路少三十驿，陆路少七驿；如遇发兵，自成都至重庆虽三十六驿，然顺流而下，舟行捷疾，以及贵州陆路止一十四驿，若湖广至辰溪一十六驿，辰溪至贵州二十一驿，皆诉上流，驿虽少而路远于成都矣。今议以贵州卫属成都都卫，便于节制；而凡军务之急者，贵州一移文成都都卫，一移文武昌都卫。若民职有司护属湖广行省为便。诏可之。”<sup>[18]</sup>（卷70《太祖洪武实录》）从李文忠奏疏可知，成都至贵州比武昌至贵州方便，因为武昌至贵州沿逆流而上；同理，贵州至武昌肯定比贵州至成都要方便的多。贵州在元明之际，其归属一直摇摆于四川和湖广、或者云南之间，皆在于贵州至周边区域的不便，这种不便至明前期，由于西南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在贵州设立单独的地方最高行政系统显得必要，从而使“贵州”进入全国十三布政司之列。

#### 四、



明代洪武、永乐时期，因贵州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西南在国家整体国防体系中战略地位的提高，使湖广经贵州至云南的“一线路”成为经营西南的关键。《明史·贵州土司》记载：“其地西接滇、蜀，东连荆、粤。太祖于《平滇诏书》言：‘霭翠辈不尽服之，虽有云南不能守也’，则志已在黔，至成祖遂成之”<sup>[19]</sup>（卷316《贵州土司传》）。贵州省成立之初，在经济上无法独立，需要依靠邻省供应；之所以建省，只是因为贵州“一线路”的重要性。郭子章《黔记·止榷志》记载：“盖贵州乃古罗施鬼国，地皆蛮夷，山多箐穴，水不涵淳，土无货殖，通计民屯仅十四万石，为天下第一贫瘠之处，官戎岁给全仰于湖广、四川二省，盖本非都会之地，从古不入版图。我朝但因云南而从此借一线之路以通往来，一线之外，悉皆夷峒。”<sup>[21]</sup>（卷13《止榷志上》）王士性《广志绎》也说，“其地止借一线之路入滇，两岸皆苗”<sup>[2]</sup>（P325）。可见，尽管贵州建省已200多年，国家对贵州的直接控制和经济文化影响几乎还是在“一线路”及“一线路”周围；也可以看出，明代对贵州的经营重点也是在这一条“官道”上。

明代在贵州“一线路”上设置卫所、驿站等，其主要功能在于保护和维系“一线路”和国家“通道”。据万历《贵州通志》记载，贵州“一线路”驿站所应付的赋役，主要是为云南入湖广的花费：“据贵州按察司驿传道呈称：查得贵州驿站，万历七年（1579）自正月日起至十二月终止，应付过云南马二千八十八匹，夫二千七百三十一名，本省止用过马一千三百三十七匹，夫一千三百九十一名。以十分为率，在云南用过七分，在贵州止及三分。至于上六卫、西四卫各驿站不下数千，尽皆云南过客，而本省之用，则十无一二。是驿站答应，本省有限，应递云南甚繁。矧各贫军代民养马，累及借贷，贻害身家。卫、所、站、堡军夫，数不满百，朝夕杠抬，肩无息期。随查平溪、清浪、镇远、偏桥四卫，所、站、堡虽隶湖广，所辖实在贵州境内，一应由贵入滇者，此为门户，该卫站应付，络绎相寻，较其苦楚之状，实与贵州相同”<sup>[12]</sup>（卷19《经略志一》）。

明代以经营“一线路”为主，国家对贵州的影响也主要在一线路及其周边区域，如明代卫所设置所形成的沿一线路分布的“屯堡”和城市，在贵州境内形成一条带状，自东向西延伸。但随着卫所军屯的展开，内地汉移民开始沿交通线进入贵州，如嘉靖《贵州通志·户口》记载：“贵州四面皆蛮夷，所可知者，各府若卫军民之数甚寥落也。蜀中江右之民侨寓于此者甚众，买添宅长子孙者益多有之。”<sup>[22]</sup>（卷3《户口》）贵州至嘉靖时民户人口与军户人数数已经相差不多，“司府州卫所军民人户一十四万八千九百五十七户，五十一万二千二百八十九丁口；军户六万二千二百七十三户，二十六万一千八百六十九丁口，民户五万六千六百八十四户，二十五万四百二十丁口”<sup>[22]</sup>（卷3《户口》）。在风俗方面，则汉族移民与本土居民互相影响，如万历《贵州通志》记载宣慰司，“本州隶籍人民，多来自中州，风声气习，一如中华”，并在城市周围形成集市，“贸易以十二支所肖为场，附郭兔、猴、鼠、马四场”<sup>[12]</sup>（卷4《宣慰司》），这些集市也将周边非汉族群吸引进来，自然加强了文化、经济的交流。思南府朗溪司的土著由于长期与汉族交往，习俗开始与汉族相似，“曰峒人者，多以苗为姓，皆前代避兵流民，以猎为业，近亦颇类汉人”<sup>[12]</sup>（卷16《思南府》）。

明代贵州建省在于路，由于路导致明代国家对西南腹地的非汉族群实行从控制到治理的变革。明政府在与西南非汉族群打交道的过程中，意识到，单纯地靠武力征服形式是难以保障道路安全的，何况因贵州山地造成的驿道艰难，如果没有当地非汉族群的参与维系，贵州“一线路”上沉重的负担，卫所军民不可能承担的起。西南非汉族群也因族群之间的争夺，需要稳定的公共秩序，尽管国家在一些情况下因赋役而盘剥民众，但具有良知的官员知识分子还是为当地社会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成绩。如万历时贵州巡抚江东之《建湖广天柱县疏》中就指出当地苗侗之间因互相仇杀，加上卫有贪官，县有贪民，残害土著民族，因此苗侗汉等民众都有建县的需求，“峒民素不甘心，日望建县更切于苗也”，当地官员朱朱梓获得当地非汉族群的拥护，“诸苗慕之如慈母，畏之如神君，令之即行，禁之即止，虽有一二奸徒阻挠之谋愈巧，百于苗裔归附之诚愈坚。闻职复来，相率迎于三百里之外”<sup>[12]</sup>（卷19《经略志一》）。

贵州的建省是明代在战国秦汉以来，特别是元代西南经营的基础上进行的。贵州作为西南对



外“通道”，很早就已经出现，汉武帝第一次将“通道”纳入国家控制之下，但由于国力有限，国家逐渐退出贵州，将直接控制改为羁縻。隋唐时期，国家重新进入西南，并打通了从北到南的“通道”。元代云南经济得到发展，中南的湖广行省成为当时核心经济区，打通云南到湖广的自西到东的“通道”成为时代之所需，元代第一次将贵州东西“通道”打通。明代朱元璋继承元代西南政策，不仅打通了湖广经贵州至云南“通道”，而且还专门设立贵州省以保护这一条路。这一通道不仅成为国家力量渗入西南非汉族群的“通道”，也是西南与内地沟通的“民族走廊”，即“苗疆走廊”。西南地区也因这一条路而发生了巨大的经济、社会、文化的转型，不仅出现了南方汉移民自东向西的大迁徙，而且西南边疆出现了内地化进程，影响中国历史甚巨。

#### 参考文献:

- [1]李化龙,《平播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2]王士性,《五岳游草·广志绎》,北京:中华书局,2006.
- [3]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北京:中华书局,1997.
- [4]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北京:中华书局,2005.
- [5]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版.
- [6]贵州省博物馆,“贵州清镇平坝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1).
- [7]贵州省博物馆,“贵州黔西县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11).
- [8]唐文元,“黔西甘棠汉墓群”,《贵州文物》1982(1).
- [9]任可澄等,《民国贵州通志·前事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
- [10]脱脱,《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
- [11]宋濂,《元史》,北京:中华书局,1976.
- [12]许一德等,《(万历)贵州通志》,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
- [13]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北京:中华书局,1959.
- [14]解缙,《永乐大典》,北京:中华书局,1982.
- [15]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 [16]李瀚章等,《(光绪)湖南通志》,长沙:岳麓书社,2009.
- [17]毕沅,《续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2008.
- [18]《明实录》,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 [19]张廷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
- [20]郭红,靳润成,《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明代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 [21]郭子章,《黔记》,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
- [22]谢东山、张道,《(嘉靖)贵州通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本期责任编辑: 马戎、王娟  
邮编: 100871  
电子邮件: marong@pku.edu.cn

